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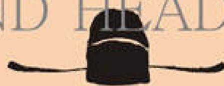


◆ 吕博 著


#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

## 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

# THE POLITICAL HISTORY BEHIND HEADWEAR



FROM THE STYLE OF KINGS SURNAMED WU
TO OVERSTEPPING STYLE OF THE FIVE DYNASTIES


四川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吕博 著

#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

## 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

THE POLITICAL HISTORY BEHIND HEADWEAR



FROM THE STYLE OF KINGS SURNAMED WU TO OVERSTEPPING STYLE OF THE FIVE DYNASTIES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受到“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礼仪实践与唐代政治社会变迁》，项目号：15YJC770019”资助

#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

## 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

吕博 著

THE POLITICAL HISTORY
BEHIND HEADWEAR

FROM THE STYLE OF KINGS SURNAMED WU
TO OVERSTEPPING STYLE OF THE FIVE DYNASTIES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吕博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2

（微观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ISBN 978-7-220-10845-7

I．①头…　II．①吕…　III．①头饰-关系-官制-研究-中国-古代　IV．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8657号




#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

## 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

TOUSHI BEIHOU DE ZHENGZHISHI
CONG “WUJIA ZHUWANG YANG” DAO “WUDAI JIANYUE YANG”

吕博　著

策划组稿　章涛　赵静

责任编辑　陈欣

封面设计　张科

版式设计　戴雨虹

责任印制　李剑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08mm

印　　张　6.25

字　　数　121千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845-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453

特别说明

因客观原因，书中部分图片未能直接联系到权利人，已尽量标明出处。如有图片为有偿使用但出版时未联系权利人购买，烦请权利人知悉后联系我社以获取图片使用费。

# 目录

引言　“服饰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视角
第一章　从“平头小样”到“武家诸王样”
第二章　从“英王踣样”到“官样圆头巾”
第三章　从“山子军容头”到“五代僭越样”
结语　微观史——唐代政治史的“头饰”观察
后记

# 引言

# “服饰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视角

## 三个场景：他们看到了什么？

赵郡李氏之后李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在此书信中，李华通过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谆谆教导两个外孙。书信中提到唐代风俗数端，冻国栋先生曾有细致揭示。[1]其中有关唐代都城头饰时尚的内容，透露出李华一直通过服饰来观察社会习俗的变迁。他是这样说的：

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羃□，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触类而长，不可胜言。举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谓幼小，不遵训诫。所见所闻，颓风败俗。故申明旧事，不能一一也。[2]

其中的第一人称“吾”指李华。[3]李华生于开元三年（715），幼时为开元十年（722）前后。他于洛阳南市，逛“帽行”[4]的时候，突然观察到帽行所卖之帽，貂帽多，帷帽少。看到这样的着装变化，当时守旧的人已经在感叹风俗不再淳厚。

李华的观察大致符合史书的记载。在武德、贞观年间，宫女骑马外出，全身都要被羃□遮蔽。被遮蔽的形象如下图：



图1　彩绘骑马戴羃□仕女俑·唐[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2　《树下人物图》·唐

（吐鲁番出土，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中人物头戴幂□。



图3　《持羃□女侍图》·唐[6]

（唐燕妃墓出土）
图中人物手持纱状羃□。

但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这种遮蔽的情形就出现变化，“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正因为“到颈浅露”的帷帽逐渐取代了“全身遮蔽”的羃□，所以这种着装风俗被认为“深失礼容”。唐高宗统治时期曾专门下诏强调“自今已后，勿使如此”。但诏令的申禁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到唐中宗神龙末年，包裹全身的羃□“始绝”。[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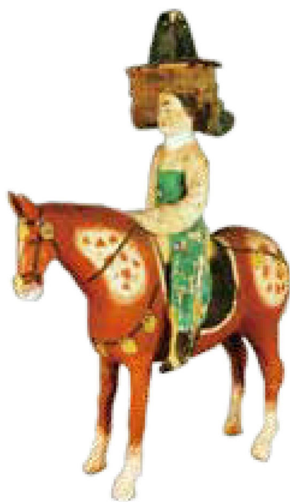


图4　彩绘骑马戴帷帽仕女泥俑·唐[8]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5　彩绘戴帷帽骑马仕女泥俑·唐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6　骑马伎乐俑·唐[9]

（西安博物院藏）
骑马女俑全无遮蔽。

李华人到中年，曾在首都长安西市闲逛，突然发现帽行里没有帷帽卖。[10]社会上出现了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情形，所谓“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如果此时再有戴帷帽、羃□的妇女，必然被视作异类，会有人用瓦石投射攻击她们。看到这样的着装情形，李华颇为不解，进而又感叹说“颠之倒之，莫甚于此”。李华在街头“细腻”的观察依然能被《大唐新语》的记载所印证，“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傚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11]。开元天宝之际，妇人“领巾覆头”“露髻驰骋”已十分常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三月春光明媚，游春仕女乘车跨马，红裙相连制成帷幄，无拘无束，尽享春日。[12]根据《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描摹，其中不乏女扮男装、头戴幞巾的宫女。

服装，作为显著的社会符号和标志，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划清性别的界线。而服饰在性别上所刻画出的分界线，绝不仅是两性在外观上的区别，它更意味着表象之下的价值与能力，以及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13]性别间的易装行为模糊了两性外观上的区别，无异于颠

覆了当时社会最基本的规则——礼法。李华出身赵郡李氏，这样的名门一般世代言行守礼，所以他从社会当中流行服饰看出的是“颓风败俗”。他记录自己的观察，写信给两个外孙女，是希望她们作为名门之后，应当诫遵训诫，切莫奇装异服。

以上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李华的观察。当时的普通百姓在唐代长安城中能看到什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人——东城老父贾昌，他通过服饰感知到了开元天宝之际的另外一种社会变化。据《东城老父传》记载：

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廛间，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近者，老人扶仗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14]

经过安史之乱，贾昌年老行动不便，他伏腊日休息，拄杖出行，四处观望，发现穿白衫的人数却不满百人，进而感叹：“难道天下之人，都去当兵了吗？”老父贾昌之所以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平民穿白衣，士兵着皂服。[15]他回忆起自己开元年间闲逛街头的所见所闻。彼时，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多着白衣而少穿黑衣。以致有人禳除病患需要用黑布的时候，重金求购却不得，后来竟然用制作幞头的“黑罗”代替。天宝之后，兵额剧增，长安城中的士兵亦多，所以街头的着装风尚也有所改变。[16]老父通过服饰的变化对中晚唐武人增多的情况有着准确的观察。

身处唐代官场的人颇看重官服，他们通过官服可以迅速判断不同官员的等级。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当中曾写过一条笔记叫“唐人重服章”，他所举的例子都是杜甫、白居易的诗歌：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

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七言如“大抵着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着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閤”“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着绯衫”“绯袍着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暂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着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着绯”“那知垂白日，始是着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17]

在杜甫、白居易等人诗歌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章服的内容。这说明他们身处唐朝官场熟知服色代表的意义。服色即意味着官品等级，被著入衣服令。

唐代官僚服制等级表

| | | | | | |
|---|---|---|---|---|---|
| 一品 | 紫 | 金玉带十三銙 | 三梁冠 | 金鱼袋 | 象笏 |
| 二品 | 紫 | 金玉带十三銙 | 三梁冠 | 金鱼袋 | 象笏 |
| 三品 | 紫 | 金玉带十三銙 | 三梁冠 | 金鱼袋 | 象笏 |

续表

| | | | | | |
|---|---|---|---|---|---|
| 四品 | 深绯 | 金带十一銙 | 二梁冠 | 银鱼袋 | 象笏 |
| 五品 | 浅绯 | 金带十銙 | 二梁冠 | 银鱼袋 | 象笏 |
| 六品 | 深绿 | 银带九銙 | 一梁冠 | | 竹木笏 |
| 七品 | 浅绿 | 银带九銙 | 一梁冠 | | 竹木笏 |
| 八品 | 深青 | 鍮石带八銙 | 一梁冠 | | 竹木笏 |
| 九品 | 浅青 | 鍮石带八銙 | 一梁冠 | | 竹木笏 |
| 庶人 | 黄白 | 铜铁带七銙 | | | |



图7　《提槃囊给使图》（摹本）·唐[18]

（阿史那忠墓出土）

图中人物为着绯红袍的官员。



图8　《袖手男装女侍图》·唐[19]

（韦贵妃墓出土）
图中人物为着绿袍的官员。

唐周革命时，有一位名叫傅游艺的官员，因为积极支持武则天革唐为周，被火速提拔，连升数级，成为宰相，被人们称作是“四时仕宦”：

又以司宾卿溧阳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侍御史来子珣等并赐姓武。秦客潜劝太后革命，故首为内史。游艺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20]

当时人通过傅游艺一年之内“青、绿、朱、紫”的官服变化，就可

以感受到傅游艺的升迁之快。

举以上几个例子是说，无论是李华还是东城老父，抑或诗人白居易，他们通过服饰可以感知到很多社会信息。穿戴某种服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需要我们将服饰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去认识。

## 本书的思路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某一种服装作为时尚突然流行。对于一种服饰为何会流行，研究者通常有以下几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服饰的流行有自生的内在逻辑，并不受社会力量的制约或者外部条件的驱动。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 Kroeber）认为女性服装一般遵循着每五十年循环流行这样一个“内在的”“本质的”规律，基本不受外部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21]同样，英国当代的艺术史家詹姆斯·拉维（James Laver）认为，研究服饰的历史就是要克制从社会史中寻找动因，相反，要从服装自身的发展演变中探寻变化的趋势。[22]

汤晓燕评论以上意见认为，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坚持看成他们对自己借以栖身的工作领域的某种“保护措施”，也就是坚持服装史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1957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与服装社会学——方法论的观察》一文。巴特认为，服装史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初，它只是某种素材集，是被手艺人、画家或者是剧作家用来给他们的作品添加些“原汁原味”的材料；此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吉歇翰（Jules Étienne Joseph Quicherat）、德迈（G. Demay）以及恩莱（Camille Enlart）等博物学家或档案学家开始关注服装出现的时间及缘由，并尽可能厘清服装演变的过程。换言之，这些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服装材质样式的变化（比如女式裙装裙裾的长短、刺

绣的工艺，等等），但他们几乎不关心服饰发展背后的历史与社会因素。他们把服装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当成某种遥远的舞台背景，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展示服装这一主角而提供的一个时空范围。巴特认为这种不从社会史的研究中汲取养分的“自成一体”的模式一直占据着服装史研究的主流。以上是巴特针对欧洲服饰史研究的评论，但其实早期中国服饰史的研究，也注重“技术”“工艺”“类型”等方面的研究，而忽略服装的社会意义。

显然，巴特对这种服装史的研究范式并不满意，他进一步说：“服饰应该看作是一种风俗惯习，应该在社会层面来加以研究，而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美学或是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不能仅仅研究品味、潮流和方便性。他们应该厘清、协调并且解释那些（出现在服装史中的）整合、运作、限制、禁止以及抵触的规律。他们要研究的不是图像，或者风俗的特征，而是关系和价值。”巴特并不摒弃对服装自身材质样式的研究。不过，在他看来，要把服装外部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与服装内部的自身结构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变化动因。他说：“研究服装特别之处在于必须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大结构，从它身处的历史之中去把握；同时，也不能忽视它自身结构的构成。”[23]

确如巴特所言，服饰除了作为人的装饰保暖必备物品之外，内含多种社会信息。相比于博物学家，历史学家去研究服饰史的使命就在于需要从服饰变迁的历史上看到更多的政治、社会信息。最简单的问题便是：什么力量驱动服饰变迁？

研究中国古代的服饰，历代《舆服志》是值得重视的内容。其实，正如《百官志》所记那样，王朝史中有关舆服制度的叙述[24]，是对王朝秩序整齐划一的构建，并不能等同于舆服实际运作的常态。由是，周一良先生主张透过礼志（包括冠冕）研究官制[25]，可谓慧眼独到。此前，日本学者小林聡顺此思路围绕印绶制度有过数篇精到研究。[26]近来，阎步克先生曾就《周礼》六冕制度对历代冕制的影

响有过系列探讨，尤其他就服饰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学术回顾与若干认识，给研究者不少启发。[27]不过，以上学者重视的是舆服制度所暗含的“等级”。但是，除等级外，服饰配件与饰品有时也是政治运作的一种表征，传达着文化、社会地位、职业、道德与宗教关系、婚姻状态等社会信息。如果将一个时代比作一个鲜活的个人，正像一个人具备某种性格一样，这个时代也有某种“时代格”。[28]此种时代格，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日用物品上。在共同的时空或者文化语境中，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物品”辨识出相关的文化讯息。[29]如果不同的团体对于同一件服装解读出不同的含义，则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处在同一知识和经验语境中。

服饰在中古历史中常常有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标识[30]，不同的着装会带来不同的视觉、心理感受。可能正是因为服饰彰显着人物的阶层、地位，所以史籍中屡以“衣冠门户”“当朝冠冕”之语，摹状贵族。中古政治史的演进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饶有兴味的现象：在政治异动中，服饰“时尚”往往成为政治动向的晴雨表。[31]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服饰可被视作权力更替的表征。服饰作为一种“历史景观”，本应是“门阀时代”习见的政治文化场景。[32]不过，由于史料的载体主要是文字，所以历史工作者的研究，往往失去了历史场景的丰富画面。如果串联服饰变迁之历史，是否也能从别样的视角来观察政治演进的画面？如何从服饰的时尚当中展示政治演进、社会变迁的历史，是本书探研相关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视角。[33]而本书具体的着眼点则是唐代“幞头”的变化脉络。在这里，我们还无力对唐代服饰进行全面的研讨，但我们希望服饰研究能从单纯的类型学的描述扩大到发掘服饰的社会意义。此小书希望从“幞头”这样一种头饰的变化当中读到更多当时的政治、社会信息。在我们看来，“舆服志”著录的每一次服饰变化，其实都是一次政治事件。

---

[1]冻国栋：《读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论唐前期风俗》，《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武

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5—202页。

[2]〔唐〕李华：《李遐叔文集》卷一，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3]关于李华生平考订成果甚多，此处参考冻国栋《读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论唐前期风俗》，第31页。

[4]南市即隋之丰都市，市内多商行，有帽行自不例外。“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丰都市唐代改为南市。同参〔清〕徐松等撰，〔清〕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南市”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0页。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古代西域服饰撷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94页。

[6]燕妃，武德四年（621），十三岁为秦王李世民妃。咸亨二年（671）卒。其墓壁画所反映的羃□应为唐前期的情况。从疏散的垂丝网来说，此时的羃□可能已不具“全身遮蔽”的功能。参见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唐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7]〔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1页。其沿革又见于〔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7页。

[8]《古代西域服饰撷萃》，第97页。

[9]李炳武主编：《精彩纷呈的艺术宝库：西安博物院》，西安：西安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

[10]冻国栋先生指出“中年至西京市帽行”，应为“作者开元中后期赴长安应试入仕时所见”。参冻国栋《读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论唐前期风俗》，第32页。

[11]《大唐新语》卷一〇，第151页。

[12]〔唐〕王仁裕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裙幄”“探春”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9、56页。同参冻国栋《读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论唐前期风俗》，第33页。

[13]参考汤晓燕《易装、性别与权力——略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亚马逊女战士”服饰》，《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1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八五《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4页。

[15]《通典》卷一六九《刑典守正》载：“黑袄子即是武夫之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376页。）另有证据是《唐会要》卷七二记载：“广德二年三月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着皂衫及压耳帽子，异诸军官健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40页。）《唐语林》卷七《补遗》云：“唐末士人之衣尚黑，故有紫绿，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俱皂。此其谶也。”（〔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81页。）

[16]唐安史之乱后，兵员增加，通过以下两处记载可见。《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云：“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第424页）《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载开成二年正月庚寅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序：“至德、乾元之后，迄于贞元、元和之际，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掎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约计中外兵额至八十余万。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又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奉一兵。”（第567页）

[17]〔宋〕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15页。

[18]《昭陵唐墓壁画》，第193页。

[19]《昭陵唐墓壁画》，第135页。

[2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68页。

[21]转引自汤晓燕《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22]转引自《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第3页。

[23]巴特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他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一书中。（［法］罗兰·巴特著，敖军译：《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此处转引自《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第1—9页。）

[24]参见［日］中村圭尔著，付晨晨译，魏斌校《六朝官僚制的叙述》，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六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286页。

[25]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3页。

[26]［日］小林聡：《晋南朝における冠服制度の変遷と官爵体系—〈隋書〉礼儀誌の規定を素材として—》，《東洋学報》1996年第77卷，第3、4号，第233—266页；《漢六朝時代における礼制と官制の関係に関する一考察—礼制秩序の中における三公の位置づけ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2002年第60卷，第4号，第105—136页；《西晋における礼制秩序の構築とその変質》，《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002年第30卷，第27—60页。

[27]参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1页。

[28]参见［日］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文版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9]讨论服饰背后的政治文化，可以参看［美］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一书的观点（Arjun, Appadura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他为物的生命立传，把物看作与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

[30]社会角色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的定义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详参［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49页。

[31]有关唐代服饰、妆容时尚的研究，参见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3—104页。近年，纳春英也对唐代服饰时尚有过论述，参见氏著《唐代服饰时尚》，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9年。本书想尝试的工作是，将头饰时尚与政治变动结合起来进行观察。

[32]有关服饰与士族的研究，参见王力平《中古士族与时尚——围绕服饰、语言与礼仪的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7—119页。实际上，正如沈从文所说："汉、晋之际，或因为经济贫乏，或出于礼制解体，人多就便处理衣着，终于转成风气。武将文臣、名士高人，着巾子自出心裁，有种种不同名目。"参见沈从文、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33]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新史学》1999年第10卷第3期）、《明代禁奢令初探》（《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94年第22期）两篇论文，对明代服饰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就中古史而言，可能由于材料的问题，鲜有类似的研究。

# 第一章

# 从“平头小样”到“武家诸王样”



关于唐代服饰，《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中有关“武周舆服”的一段话，颇引人注目：

武后擅政，多赐群臣巾子、绣袍，勒以回文之铭，皆无法度，不足纪。[1]

唐代大抵被欧阳修视为礼崩乐坏的衰世。因此，在他眼里，武周王朝对传统礼法的颠覆与破坏，就更不必言了。[2]欧阳修作为史家，未纪武周，不修备典，只是他“春秋笔法”的一种修史立场而已。可是，正是由于这种立场，一些本值得重视的历史波澜也会因历史学家的理念而被遮蔽。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考虑，欧阳修眼里的这种“僭越法度”的作为，恰可能是武则天建立“新秩序”的方式。进而言之，武则天这种突破传统礼制“秩序”的非常手段，也有可能是当时最具代表意义的事件。那么，武则天是如何通过欧阳修弃之不谈的“服制”，重建秩序的呢？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载：

武德已来，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头小样者。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3]

引文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巾子从高祖武德年间到武则天时期的样式变化。似语惯见常物，无甚新奇特笔之处。《隋唐嘉话》亦云：“旧人皆服衮巾，至周武始为四脚，国初又加巾子焉。”[4]所谓“国初”，即唐朝立国之初。从出土文物来看，这种平头小样，确实在唐前期流行。



图9　《侍马图》（局部）·唐[5]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8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画中男子头戴黑色平头幞头，身穿圆领白色长袍，脚蹬黑色长筒靴。



图10　仪仗队列（局部）·隋[6]

（潼关税村隋墓出土）

壁画人物所戴幞头为典型的平头小样。幞头头顶较平，脚软而长。这说明唐初的平头幞头是沿袭隋代的形制而来。



图11　《出行图》（局部）·唐[7]

（李寿墓出土）

图中人物所戴幞头即为平头幞头。



图12　《步辇图》·唐·阎立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坐在步辇上，戴平头幞头的人物是唐太宗。

但若仔细玩味，却也让人产生如下疑问，武则天为何会心血来潮推行武家头饰？为何武家诸王要一改武德以来的平头小样风潮，改戴高头巾子？

《唐会要》《通典》同记此事，略有不同。《唐会要》云：“天授二年，则天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8]《通典》称：“天授二年，武太后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9]按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已经称帝，杜佑此处谓“武太后”，只是因为笔法之故。二书所载，似乎也没透露出更多的讯息，不过，却增添了此事发生的时间和场合——“天授二年”“内宴”。

又《中华古今注》云：

隋大业十年礼官上疏，裹头者宜裹巾子。与桐木为之，内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沿至证圣二年，则天赐群臣然[10]葛巾子，呼为“武家高巾子”，亦曰“武氏内样”。[11]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亦载：

唐武德中，尚平头小样者。证圣二年则天临朝，以丝葛为之，以赐百官，呼为“武家样”；又有高头巾子，亦呼为“武家诸王样巾子”。[12]

《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所记巾子推行时间，与《通典》《唐会要》颇有歧异。按前两种文献所云，在天授二年（691）之后的证圣二年（696），武则天曾推行过被称作“武氏内样”或者“武家样”的巾子。这与天授二年“武家诸王样”的命名微有差别。《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尚能述其材料形制，谓“以丝葛为之”“武家高巾子”，似言之凿凿。如果《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所记不误，那么便可证明“巾子”此种头饰，有从天授二年“武家诸王样”到证圣年

间“武家样”的变化。但此处颇怀疑“证圣二年”应是“天授二年”之误。“武氏内样”“武家诸王样巾子”，可能本为一物。

又《南部新书》同记“武家样”：

武德初，使用丝麻为之，头初上平小。至则天时，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号为“武家样”。[13]

此处之“武家样”，似与前述“武家诸王样”无甚区别，均是“高头巾子”。究竟是因为《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成书在后，层累地增加了“武家样”的内容，还是因为《南部新书》作者因误以为“武家样”和“武家诸王样”为同一物品，做了不应该的省略？这些问题由于文献不足征，已不可考。但不论怎样，比对上述文献，可为解决开篇提出的诸问题提供两条线索，一为时间：天授二年；二为人物：武家诸王。

新出武周授封武承嗣的册书，表明武家诸王的册封仪式当在“天授二年二月廿五日”。[14]而“武家诸王样”的推行，与武家诸王的分封同在天授二年。从前后关系而言，“武家诸王样”的推行，应当在武家诸兄册封仪式之后，[15]也就是在天授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后。

倘若循此“诸王”线索，将目光聚焦于天授二年前后的武周政局，前追帽式流行的方式，然后再来观察“巾子”的式样变化，遂会发现：武则天内宴赐巾子的举动，可能意在“武家诸王”，而不在“样”（规格，标准器）。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帽式名称，如果放到“周唐易代”的历史线索中去审视，可能会具备独特的政治意义。[16]

# 一　武家诸王样的“爵位标识”与“武姓色彩”

冠冕与氏族，如同表里，因此冠冕经常成为达官氏族的代称。《氏族》曾云：“崇我唐朝人物冠冕。”[17]《嫁娶》云：“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18]唐人也曾认为“在人之身，冠为上饰”[19]，在人身体的各部分装饰中，头饰最能引起他人的关注。

揆之史籍，北周以来的头饰时尚脉络，就多为帝王或著名政治人物所引领。突骑帽之流行，因为周文帝而起。《隋书》卷一二《礼仪志》载：“后周之时，咸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着焉。相魏之时，着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20]从遮项、索发之遗象来看，颇怀疑突骑帽就是风帽的某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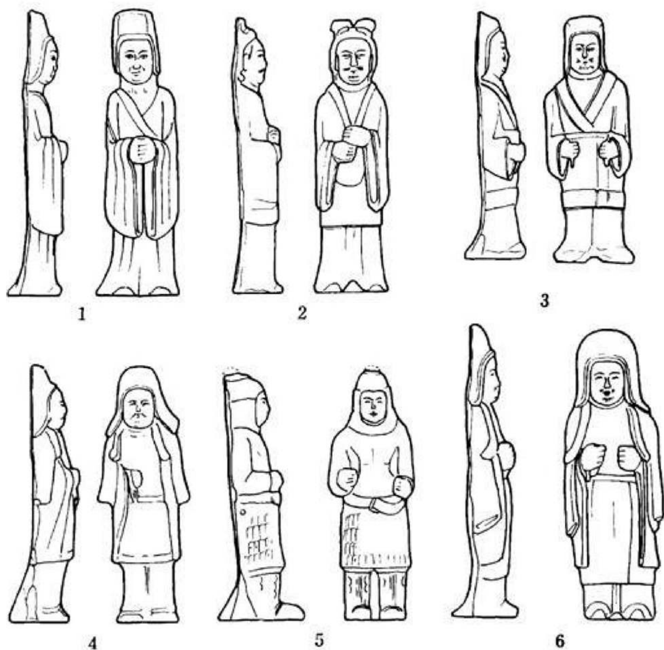


图13　北周武帝陵中的几种风帽俑[21]

1. 笼冠俑（4号天井东龛：69）2. 小冠俑（4号天井东龛：44）3. I型风帽俑（4号天井东龛：159）4. II型风帽俑（4号天井东龛：59）5. 兜鍪甲士俑（5号天井东龛：4）6. III型风帽俑（4号天井东龛：77）（均为2/5）



图14　《鞍马导引图》（局部）·北齐[22]

（娄睿墓出土，山西省博物院藏）
图中人物戴风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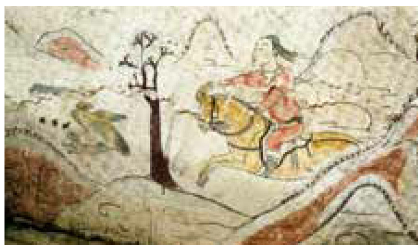


图15-1　《放鹰逐兔图》（局部）·北朝

（九原岗北朝墓出土）
图中人物所戴为风帽。



图15-2　《出行图》（局部）·北朝[23]

（九原岗北朝墓出土）
图中为戴风帽的武士。

开皇初，隋文帝杨坚以乌纱帽标识自己的身份。上好下甚，因“高祖常着乌纱帽”，所以“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着入朝”。与乌纱帽相配合的服饰有黄纹绫袍、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等，亦呈现出浓厚的“戎狄色彩”。[24]

关陇贵族出将入相，带有浓厚的武人气息。由是，象征武力的折上巾子取代乌纱帽，成为风潮。[25]隋代权臣宇文述“素好着奇服，炫耀时人”，他的“许公帊势”便是最早用爵位命名的帽样。[26]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之前，太子李建成曾佩戴“花搭耳帽子”，田猎游宴。搭耳帽子本是胡服，源于赵武灵王，原名“爪牙帽子”，属军戎之装。太子李建成佩戴的同时，赐予武臣及内侍从。想必在武德之际，这种以花装饰的搭耳帽子[27]，也是一种流行的“景观”。



图16　唐三彩胡人俑·唐[28]

（西安南郊墓出土）

此胡俑的布夹头耳，可能与许公帊势相近。



图17　《乐伎图》（局部）·唐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有学者认为吐鲁番市出土乐伎所戴的帽子即为搭耳帽子。

贞观八年（634），唐太宗推行了名叫“翼善冠”和“进德冠”[29]的头饰。他的理由是政局由武入文，头饰的象征意义也应当改变。“幞头起自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今四海无虞，当息武事。此冠颇采古

法，兼更类幞头，乃宜常服，可取服。”[30]在元日、冬至、朔、望视朝等重要的场合，与翼善冠相配合的是衣白练裙襦，呈现出“南朝化”的色彩。据《中华古今注》记载，此种“更类幞头”的头饰，兼具二仪、三才的象征意义，可能与马周的改造有关：

沿至后周武帝，裁为四脚名曰“幞头”。以至唐侍中马周更与罗代绢，又令重系前后，以象二仪，两边各为三撮，取法三才，百官及士庶为常服。[31]

正如开篇所述，服饰如同观察社会的显微镜。无论是“文”还是“武”的时代气息，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日常物品之上。

事实上，不仅是带有政治强人色彩的皇帝、太子，就是权倾一时的大臣、亲王，也能引领头饰潮流。而且此类头饰均以爵位命名，十分值得玩味。

贞观名臣长孙无忌，权势显赫。与此同时，社会上就流行一种以他的爵位命名的帽子——“赵公浑脱帽”。此帽以乌羊毛制毡做成，如同他的姓氏“长孙”，带有浓厚的草原气息。赵公浑脱帽的流行，某种程度上可视作长孙无忌权力的外在表现方式。有学者认为阿史那忠和李震墓中牵牛人物头戴的即为浑脱帽。该帽毛峰在外，皮在内。



图18-1　《牛车图》（摹本）·唐[32]

（阿史那忠墓出土）
图中牵牛人头戴浑脱帽。



图18-2 《侍女图》·唐[33]

（韦浩墓出土）
图中人物所戴翻檐皮帽常被认为是浑脱帽。

无独有偶。贞观十六年（642）起，储君之争扑朔迷离，太子承乾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史谓："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35]太宗为李泰设立文学馆，招引学士，让李泰培养政治羽翼。后来因"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

小舆至于朝所”[36]。贞观十六年四月，太宗甚至亲作诏书让李泰移居武德殿。史书特以“礼秩如嫡”来形容宠异非常的李泰。[37]魏王以藩王谋嫡位，得势于一时。与此同时，他的头饰也别具风格，成为时尚。所谓“魏王为巾子向前踣”，名为“魏王踣样”，以至于天下有欣然钦慕的潮流。[38]



图19　胡人陶俑·唐[34]

（甘肃省庆城县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陶俑头戴典型的前踣式幞头。

不过，在魏王李泰头饰风靡天下的时候，太子承乾喜欢的服饰和习俗，却显得分外另类：

（承乾）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造大铜炉、六熟鼎，招亡奴盗取人牛马，亲视烹燖，召所幸厮养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嫠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39]



图20-1　突厥石人·唐

（胡鸿拍摄）



图20-2　突厥石人·唐

（胡鸿拍摄）
西突厥王辫发形象可能类似太子承乾的打扮。





图21-1　《石屏正面会盟图》（局部）·北周

（安伽墓出土）

右图中左边下部披发弹琵琶者应为突厥人。[40]



图21-2　《石屏正面访问突厥图》（局部）·北周[41]

（安伽墓出土）

在穹庐帐篷中，右一披发者应为突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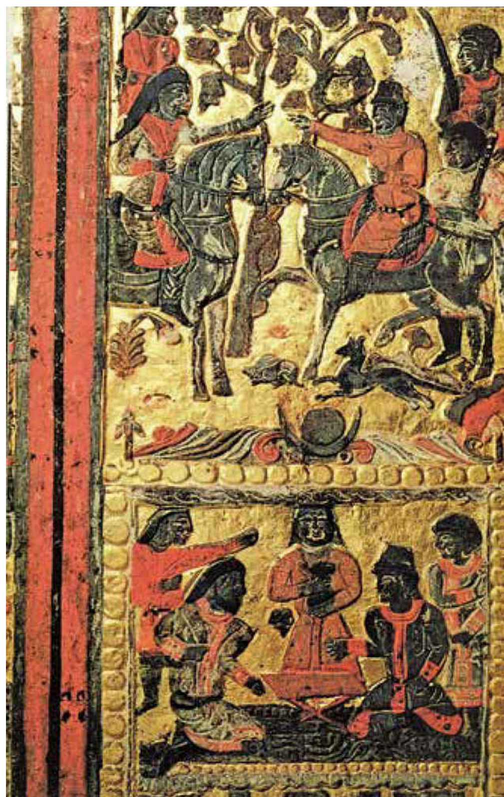


图21-3　《石屏正面会盟图》·北周[42]

（安伽墓出土）

图中披发者为突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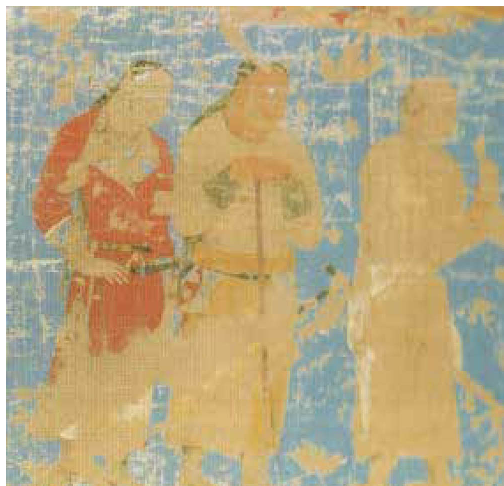


图22　《突厥武士图》（局部）·公元660年或663年[43]

（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
西墙壁画为三位披发突厥武士。

无论是长孙无忌的赵公浑脱帽，还是李泰的魏王踣样，此类以爵位命名的流行头饰，皆是武则天所处的时代熟睹的流行“景观”。武则天也应当颇为熟悉一种服饰对于政治人物身份标识的作用。同理，以“武家”“诸王”命名的头饰，会带有偏正式、符号性的政治讯息。

与名号、宗庙的“武姓”色彩相比，帽样最容易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标榜人物地位。与“赵公浑脱帽”“魏王踣样”的命名微有不同，武家诸王样以氏族、爵位同时冠名于帽样。这样偏正式的命名很可能隐藏了武则天的某些特殊心态。同时，与赵公浑脱帽、魏王踣样的自然流行不同，也与通过《衣服令》颁布的某些冠服不同，还与以《礼部式》规定的某些常服不同，[44]武则天美名曰赐，而最有可能的是在以她的威权推行。武家诸王样的颁赐，必在“武家诸王”封建之后，这样看似平常的举动，是否与武家诸王分封的政治举动有某些关联？在传统中国的秩序里，任何标识人物身份饰品的改动，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要想理解武家诸王样出现的意义，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诸王样颁行前后的政治过程。



图23　《仪仗图》（摹本，局部）·唐[45]

（懿德太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中为戴高幞头的仪卫。

如所周知，武则天出身庶族，在门阀观念镌心铭骨的时代屡遭攻击。[46]“武”屡被视作寒微之姓，难登大雅之堂。[47]可能正因为挣扎于豪门夹缝中的经历，武则天内心始终有股对姓氏萦绕难去的自卑情结。胡戟先生曾指出，武则天要想登上帝位，必须解决三个阻碍，其中之一便来自家族——武本小姓。[48]职是之故，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政治事件中，她对“武”姓之推崇，可谓不遗余力。

显庆四年（659）六月，在武则天的指使下，许敬宗等人修《姓氏录》。缘由之一，即因《氏族志》“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49]。《姓氏录》修定，后族自然列为第一等高门，打破了贞观年间才建立的姓氏序列。在“武姓”的率领下，原来的庶族，皆入名望，故谓“百官家口，咸预士流”[50]。随后，武则天的权力触角，就逐渐伸向“第一门阀”——当朝皇室李家。武姓如何逐步取代李姓，是她处心积虑的政治谋划。而此种谋划的实践，就体现在对“封建”的企盼上。

文明元年（684），武氏已为太后，临朝称制。睿宗虽形如傀儡，但总算保持着李唐国祚。可是，有史料表明，武则天此时就有封建诸武的打算：

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诸武，太上乃现于虢州阌乡县龙台乡方兴里皇天原，遣邬（元）玄崇令传言于天后云：“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天后遂寝，乃舍阌乡行宫为奉仙观。[51]

武则天的第一次封建意图是否遭到在朝权臣的反对，莫可得考，但是在李唐国教道教的降神谕示中，却遭到抵制。

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和武三思想要用现世官爵标榜武家门第，欲在宗庙中追封武氏先祖为“王”。尽管她此时权势熏天，但想改变唐代异姓不王的封建传统，还是会遭到裴炎等顾命大臣的反对。[52]垂拱四年（688）正月，武则天欲立“七室”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同时将唐太庙减为“五室”，意图在宗庙系统中颠倒李家与武家的尊卑秩序。春官侍郎贾大隐援引“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的儒家经典将武则天制止。[53]

经过追封、改易宗庙试探的失败，估计武则天也明白，要想顺利获得为武姓“册命”“封建”的权力，唯有“武姓”革命称帝一途。

天授元年九月丙子（十三日）始，武则天开始持续营造众望所归的情景，意在谋建“大周”，完成禅代。先是“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54]。从“擢游艺为给事中”的举动来看，武太后甚赞其举。但是，她又表现出“谦让不就”的态度。于是，就只有行规模更大的请愿仪式，“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55]。武则天在努力渲染一种氛围，在天下的视域中，从“治下之民”到“蛮荒夷狄”，均赞成“武”周王朝的成立。

毫无疑问，两次规模宏大的请愿活动，或是武则天默许，或是她授意。而“天下拥戴”的情景，欲消弭武则天行将篡国的不道，则不必多言。不过，请愿的目的，并没有直接表明武则天亲为“皇帝”的意图，她只是欲让皇帝李旦改姓武氏。这是她在登上皇位前，小心翼翼的谋划。此后，当群臣口言符瑞，表明天命所归的时候，武则天才完成国号改称，进而通过大赦的方式，向天下传达了这次重要的政治变革。[56]直到九月乙酉（二十二日），她才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改姓武氏，赐姓武氏，都是武则天“欲武当国”的策略。而原来的“李唐皇帝”正式变为“武周储君”，姓名也由李旦变成“武轮”。武氏地位从河东小姓，一跃成为帝王之家。那么，如何证明武氏源自历史名门，又是武则天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家庙系谱最能体现姓氏、门第渊源，身处“门阀时代”的武则天也深谙此点。丙戌（二十三日），她就在神都洛阳城立“七室”家庙，追赠武氏先祖“皇帝”称号。[57]可是，武则天所建的家庙昭穆序列，多少有些闳大不经。家庙追尊平王少子武为睿祖康皇帝，是因为他手中有“武”的纹饰，以“武”为氏。[58]通过这种牵强的举措，遂将武氏家族同姬姓西周建立了关联。一言以蔽之，自命高古，冒认先祖的举动，还是出于对武家门第不显的考虑。

武则天在以至尊称号名状父祖后，旋即以当朝爵冕来标榜武家兄侄。武氏本家男性皆被封为王：

封承嗣为魏王，元庆子夏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后从父兄子纳言攸宁为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归为九江王，司礼卿重规为广平王，左卫亲府中郎将载德为颍川王，右卫将军攸暨为千乘王，司农卿懿宗为河内王，左千牛中郎将嗣宗为临川王，右卫勋二府中郎将攸宜为建安王，尚乘直长攸望为会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绪为安平王，攸止为恒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为南阳王，延秀为淮阳王，三思男崇训为高阳王，崇烈为新安王，后兄子赠陈王，承业男延晖为嗣陈王，延祚为咸安王。[59]

其时不仅尊崇武氏外家，亲王、郡王“换李为武”，甚至连支持武则天上台的外朝新兴官僚，也都被赐姓“武”。“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侍御史来子珣等并赐姓武。”[60]而之后，女皇更是普降恩泽，有“制天下武氏咸蠲课役”之举。[61]天授二年八月，义丰王光顺、嗣雍王守礼、永安王守义、长信县主等皆赐“武”氏。[62]同年，因“女主武氏”谶言而死的李君羡被追复官爵。[63]甚至连关涉到“武”的细节文字处，也措意颇深。

《朝野佥载》卷一云：“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囗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64]虽然因为“⿴囗武”与“囚”相近，最终被废弃[65]，但女皇以武当国，抬升武家名望的心态却始终如一。武周一朝以“武”字命名的州县，数量也颇为可观。[66]易言之，武姓的推崇，始终与武周政局的演进相伴随。以上诸例，都说明在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之后，对于抬升武姓地位的政治运作颇多。门阀时代最重姓氏名望，而武则天正用门阀常用的手段摧毁着门阀。从这样的政治背景出发，再去理解武则天在天授二年将武家诸王的帽样赐予百官的举动，如顺水推舟。武家诸王样的推行，与武氏家族走上权力顶峰的律动，几乎一致。

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正式登上帝位，次年即封本家诸武为王。在当时人的视域里，武家诸王与武周王朝的命运唇齿相依。张鷟曾用数言评判武氏家族的权力成长，可谓中的：“二十余年，武后强盛，武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王十余人，几迁鼎矣。”[67]“迁鼎”之言，自是说明梁、魏、定诸王共同形塑了武家王朝的权力顶峰。那么，这种权力是如何外化展现的呢？服饰即其一端。与武家诸兄被封建几乎同时，武家诸王样被推行，如是连续的政治举措，其实都是“周唐革命”成功初始，武则天对武氏门第的一种宣示。武则天只是借助“宴会”这样一种公共场合，以赏赐头饰为借口，在鼎革之际，

彰显并巩固武姓新获的权力。一种独特的“帽子”，除了有御寒挡风的物理功能外，在当时的权力阶层中常常是一种“炫耀式着装”，具备社会角色的“个性化”标识。布罗代尔曾说：“在西方，社会地位最细微的上升都要反映在服装上。”[68]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身份制”社会里，服饰标识地位的功能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69]

武家诸王样在武则天称帝、诸武封建为王之后，推行给百官。如此举动，同武家权势的获得息息相关。文明元年、垂拱三年（687），武则天两次欲封武氏亲族为王而不得，更不用提在当时将诸武的帽样推行。帽样的推行是在武则天称帝的背景下，权力由上至下灌输的手段，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宣示方式。越是发掘这样的历史细节，越能细致入微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心理动向，越能体现权力“如毛细血管般”的输送、渗透的进程。[70]

武承嗣、武三思等皆身居高官要职。不管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笔记小说中，武则天总是以对话的方式表明她对“武氏本家”的看法。“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71]，“我子侄，委以心腹耳”[72]。无论是宰相还是心腹之谓，此番话语背后隐藏的是武周王朝的权力构造问题。由于武周王朝的权力结构并不像唐前期那样是门阀联合体，所以在权力的辐射圈内，武姓本家是离她最近的力量。垂拱年间就出现了所谓“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的现象。[73]诸武的外沿才是酷吏、科举士人。如所周知，武则天早年同自己的本家关系并不融洽，武家诸王的声誉、名望也皆为下等。可是，要想彻底割断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武姓本家还是武则天所能援引的核心政治力量。即便武家诸王的政治才能不高，但武则天还是在不断地形塑武家诸王的地位和形象。《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书》对魏王武承嗣的描述，极尽华丽辞藻，用一种代表皇帝意志的书式——“册”进行颁布，构建出武承嗣的一种历史“镜像”：

维天授二年岁次辛卯二月癸卯朔廿五日丁酉，圣神皇帝若曰：于

戏！夫乾德垂施，甄覆焘于三象；坤仪播物，总财成于万类。是知君为元首，负璇扆而法斗枢；臣作股肱，酌瑶潢而契舟楫。逮乎沣堝肇运，广命应韩，沛泽开基，分王河楚。故能光流拂若，竹园将日馆相晖；吹动生苹，兰坂与风台交映。神祊由其硕茂，宝系所以灵长。咨尔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凤阁事、监修国史、上柱国、魏王承嗣，粹府恬旷，灵机秀彻，植琼蒂以疏英，渐琁波而析润。蜺源毖祉，骧鳞翠渚之前；鷗穴抽祥，傅翼丹霄之外。骛忠庄而体国，驰孝路以形家。敦厚所宗，探楚诗而毓彩；精微是仰，搴沛易以图芳。佩玉仙闱，登五曹之显秩；连珠禁闼，践八舍之崇班。用能朱邸发挥，竭吁谟于帝命；紫台光辅，掌涣汗于王言。镜鸾渚以澄漪，蔚鸡林而耸蒨。礼高端揆，声穆搢绅，综核朝纲，允归望实。是用命尔为文昌左相，封魏王，余并如故。往钦哉！

吾闻立身之道，惟忠与孝；为政之德，在礼与仁。非忠孝无以享令名，非礼仁无以承丕训。当睿图之肇建，属昌历之初开，大启土宇，分命车服。尔其嗣箕裘之显业，当盐梅之重寄，永固藩维，长隆宗祏，以祇膺宠命，可不慎欤！

天授二年二月廿五日。

朝请大夫、守凤阁侍郎兼检校太子少尹兼修国史、上柱国臣任知古宣。[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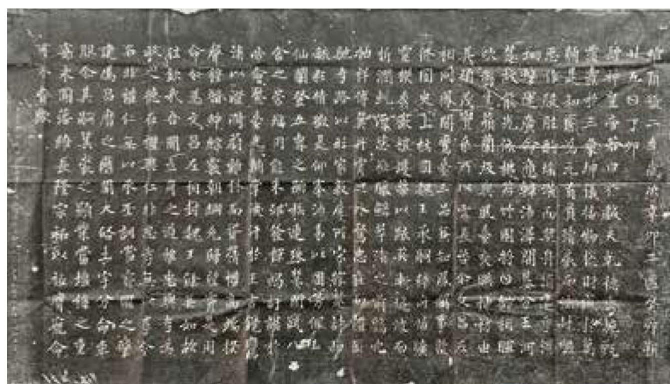


图24　《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书》石刻文（自藏拓片）·唐

（武承嗣墓出土）

武三思撰序、崔融为铭的《武承嗣墓志铭》，更是“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将武承嗣包装成一个臣子楷模。[75]

不过，在时人的眼里，武家诸王的表现与武则天想要塑造的形象，存在着“视觉差”。武承嗣、武三思在时人的描述里，皆是酷忍残暴、徇私舞弊的面目。[76]那么，武家诸王在历史中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的呢？或者说头饰的“肖像”层面是如何在历史中展现的呢？所幸，有段史料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些历史细节。有时这种不经意的记述，反而会比刻意的记述，更为准确地保存一些重要的史事，起到专门著述无以替代的作用。[77]

## 二　“诸武狭丑”与“头戴高巾”：武家诸王历史形象之一侧面

《朝野佥载》有关武懿宗着装的描述，十分有趣：

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78]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蹿。”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叶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菶韵。”元一应声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

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歌”。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拖绿草罗。定知纱帽底，形容似大歌。”则天大笑，县主极惭。[79]

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是武则天上台以来遇到的最大军事挑战之一。其实，作为武家诸王的代表之一，河内王武懿宗原本并非将才，而且政治才能实在平庸，前往河北平定奚、契叛乱本非恰当人选。不过，武则天执意任命武懿宗为元帅，恐怕是担心大军在外失控。再者，像武三思、武懿宗等诸王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们政治才干原本平庸，多为原来属“唐”的清流大臣所不齿。武则天派武懿宗肩挑大任，可能也有想通过战功增加其政治资历的意味。但是，结果恰好相反。尤其是武则天用政治命令推行的诸武头饰，反而成了朝野当中的谈资笑柄。构成上述历史图像的主要场景，正是在酒会中张元一对武懿宗的嘲谑。张元一作诗首先讽刺武懿宗的怯懦表现，诗中顺带牵出武懿宗的形体：“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这里是说武懿宗身材瘦小，即便是矮小的蜀马，他也必须踩着台阶才能上马。[80]稍后，张元一的诗歌又讽刺了武懿宗的头饰和容貌。他应声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蓁蓁。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张元一所谓“裹头”，正泛指头巾帽式。隋大业十年（614），吏部尚书牛弘上疏曰：“裹头者，内宜着巾子，以桐木为内外，黑漆。”[81]



图25　巾子·唐[82]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76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巾子是棕黑色，高11厘米，宽12厘米。展览者推测可能是以丝葛、皮革等制成，或胶质物模压而成，再经特别的涂漆处理，满布菱格，格眼方正。但据相关文献记载，巾子也有用桐木制成的。[83]



图26　《抱弓弢箭箙男装仕女图》（摹本）·唐[84]

（阿史那忠墓出土）
相比于隋代、唐代早期，此时幞头衬巾逐渐升高。

“裹头”“短丑”的字样，不自觉地让人联想到武家诸王样的形制

——“高头巾子”。河内王武懿宗所戴头饰，难道不确指武家诸王样吗？巾制形高，很有可能在掩盖武家诸王“形貌短丑”的生理缺陷。

在历史中以服饰遮丑的例子屡见。为说明问题，这里以蔡邕《独断》所记，聊举二例：

帻，古者之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也。汉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王莽顶秃，帻上施屋。[85]

又《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云：

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着（突骑帽）焉。[86]

前述《朝野佥载》引文中的“武氏最长”，似乎也说明除武懿宗身高较高外，武家诸王均可能身高不显。诸武头戴高头巾子，可能的目的是让他们的形象显得高大。有史料表明，武氏家族的男性，似乎并不英俊。[87]武懿宗短小伛偻的形象并不止上述一例。在另一种场合，当魁岸辩口的吉顼声气凌厉地对待短小伛偻的武懿宗时[88]，武则天就一改酒会嬉戏的面孔，展现出维护诸武的态度：

太后以顼有干略，故委以腹心。顼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顼魁岸辩口，懿宗短小伛偻，顼视懿宗，声气陵厉。太后由是不悦，曰：“顼在朕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89]

而武懿宗这种矮小丑陋的外貌，同他稍显酷忍[90]、怯懦[91]、愚钝[92]的历史形象，是相伴而生的。



图27　彩绘胡人牵驼木俑·唐[93]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陶俑所戴为高尖胡帽。



图28　幞头胡人陶俑·唐[9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陶俑所戴为高幞头。



图29　彩绘胡人陶俑·唐[95]

（陕西乾陵博物馆藏）



图30　彩绘胡人陶俑·唐[96]

（宝鸡陇县博物馆藏）
胡人陶俑所戴高头幞头，疑似风格受到西域胡人尖帽风格影响。

尽管大多数武家诸王在时人的描述里均是以不受肯定的形象出现的，但武则天利用舆服制度对武家诸王的包装却是全方位的。《通典》云：“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将军建昌王攸宁借紫衫金带。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依旧着紫带金龟。借紫自此始。”[97]

借紫之制始于建昌王武攸宁。之所以要用“借”的方式，是因为天授二年八月他的散官未满三品，所以只能借服紫衫。能以卑阶享受金紫的待遇，还是因为武则天对武家诸王地位的抬升。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的同时，他的散官在三品以上，所以依旧穿紫衫、带金龟。所谓带金龟，即佩戴一年前同日颁行的龟袋、龟符之制。《朝野佥载》载：“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又以铜为龟符。”[98]武攸宁身上

的金龟一来标识着他的身份，二来也有明显的天命与“武家标识”色彩。

这样的记载，恍若让人看到武家诸王头戴高巾、身着金紫、腰佩龟符活跃在朝堂内外的历史景象。[99]

由于时空变换千年，文字、图像资料有限，虽然这里尽可能利用了多种途径和方法展开相关论证，但在涉及人物具体“图景”的层面仍感乏力。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武家诸王样”特冠以“武姓”，颁行于天授二年武则天即位后不久。抛开头饰塑造形象的角度，武则天将武家诸王样赐给群臣，恐怕尚有通过威权改变臣僚“头顶景观”的意味，旨在塑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和君臣关系。诸王样的“高”，也一定表明其“异”于当时流行的样式，从而成为“武家”的特有符号之一。它可能与位阶的高低无关，而是用以昭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来临。

百官也以接受此一“符号”来宣示臣服于武氏集团，从而形成武周一朝以武氏为中心的新的政治秩序和君臣关系。这种消失的服饰影像，其实也是重要的政治运作事件。换句话说，即人都有群体性的认同，哪些人佩戴相同的饰物，穿着相同的衣服，常常被认为属于某一组织。象征通过头饰发挥作用，从而使得个体与组织的关系被“客化”。[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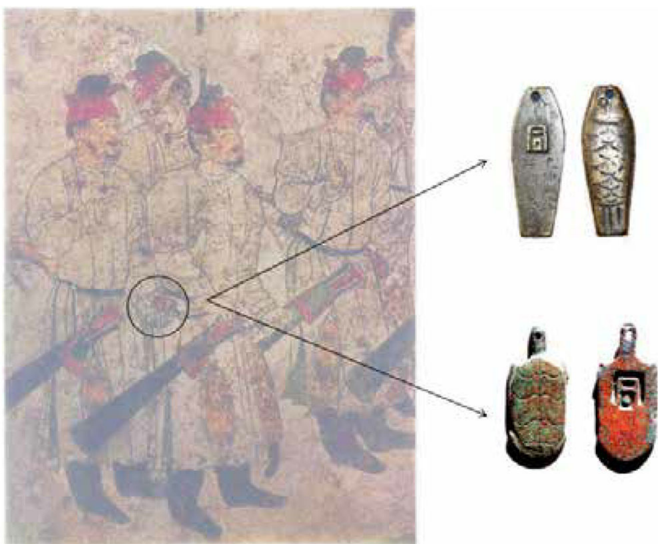


图31　《仪卫图》（局部）·唐

（章怀太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为鱼符与龟符变换图。

中宗复位，在神龙元年（705）二月重申“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旧式佩鱼袋”[101]，从龟符再变为鱼符，意味着政权从武姓向李姓回归。也许正是这样不经意的“视觉变化”，向百官宣示了李唐复国的政治变动。[102]新统治者的合法性，也是通过这样穿新服装的仪式来表达和延续的。

---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页。

[2]《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载：“武氏、中宗继以乱败，无可言者，博士掌礼，备官而已。”（第309页）

[3]《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第1953—1954页。

[4]〔唐〕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3页。

[5]《古代西域服饰撷萃》，第114页。

[6]陕西考古研究院编著：《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7]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图版2。学者孙机认为李寿墓壁画人物所戴幞头即为“平头小样”，参见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8]〔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一《巾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5页。

[9]〔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23页。

[10]“然”疑为“丝”之误。

[11]〔后唐〕马缟撰，吴企明点校：《中华古今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7页。

[12]〔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9页。

[13]〔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页。

[14]《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书》表明真正的“册封仪式”在天授二年。《册书》录文及图版，参见赵振华《谈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诏书和册书——以新见石刻文书为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5]《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条，第6468页。

[16]马冬曾就“武家诸王样”的形制有过研究，认为“高头”可能受到西域胡人“高尖帽”的影响，所论有理。参见氏著《唐代服饰专题研究——以胡汉服饰文化交融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89—210页。而一般通论性质的服饰史，也会提及唐代巾子的演化轨迹。本文所致力探索的，则是“武家诸王样”在政治演进过程中的意义及帽样产生的政治背景。

[17]《唐会要》卷三六《氏族》，第775页。

[18]《唐会要》卷八三《嫁娶》，第1810页。

[19]《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第2596页。

[20]〔唐〕魏徵等：《隋书》卷一二《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6—267页。

[21]图片节选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彩版三二。

[23]图15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

[24]《隋书》卷一二《礼仪志》，第267页。

[25]《大唐新语》卷一〇《厘革》："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第148页）

[26]用爵位命名帽样的习俗，最早见于隋代。《隋书》卷六一《宇文述传》云："述素好着奇服，炫耀时人。定兴为制马鞯，于后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轻薄者争仿学之，谓为许公缺势。又遇天寒，定兴曰：'入内宿卫，必当耳冷。'述曰：'然。'乃制夹头巾，令深帊耳。又学之，名为许公帊势。述大悦曰：'云兄所作，必能变俗。我闻作事可法，故不虚也。'"（第1467—1468页）

[27]《中华古今注》卷中《搭耳帽》，第106页。

[28]乾陵博物馆编：《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29]《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太宗尝以幞头起于后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采古制为翼善冠，自服之。又制进德冠以赐贵臣，玉璪，制如弁服，以金饰梁，花趺，三品以上加金络，五品以上附山云。自是元日、冬至、朔、望视朝，服翼善冠，衣白练裙襦。常服则有绔褶与平巾帻，通用翼善冠。进德冠制如幞头，皇太子乘马则服进德冠，九璪，加金饰，犀

簪导，亦有绔褶，燕服用紫。其后朔、望视朝，仍用弁服。”（第527—528页）

[30]《大唐新语》卷一〇，第148—149页。

[31]《中华古今注》，第107页。

[32]《昭陵唐墓壁画》，第186页。

[33]《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第269页。

[34]《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103页。

[35]《旧唐书》卷七六《恒山王承乾传》，第2648页。

[36]《旧唐书》卷七六《濮王泰传》，第2653页。

[37]《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第2730页。

[38]〔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页。

[39]《新唐书》卷八〇《常山愍王承乾传》，第3564—3565页。

[40]荣新江先生说：“根据突厥人石像和粟特地区的壁画，可以肯定此形象代表突厥首领，身着翻领白色紧身长袍，襟、袖口及下摆处均为红色。”（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41]《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75页。

[42]《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70页。

[43]［法］葛乐耐撰，毛铭译：《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图版3。

[44]黄正建先生在研究太和六年王涯有关舆服制度的奏议时，曾指出：“在唐代，规定冠服制度的基本是《衣服令》，而规定常服制度的主要是《礼部式》。”参见氏著《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卷一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45]唐昌东：《大唐壁画》，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46]徐敬业《讨武曌檄》云："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附敬业传》，第2490页。）连突厥默啜也说："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婚。"（《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圣历元年"条，第6531页。）在"废王立武"时，褚遂良言："陛下必别立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唐会要》卷五二《忠谏》，第1061页。）

[47]武则天出身寒微之家，陈寅恪先生曾有过详细考证，参见氏著《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10页；《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0—275页。

[48]胡戟：《武则天本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其后，黄正建先生也曾推论武则天母系可能并非出自隋代皇室，详参氏著《关于武则天身世的一点推测》，《武则天研究论集》，大同：山西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2—46页。

[49]《唐会要》卷三六《氏族》，第775页。

[50]《唐会要》卷三二《羃篱》，第684页。

[51]〔唐〕杜光庭：《历代崇道记》，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2—363页。

[52]《旧唐书》卷八七《裴炎传》："太后临朝，天授初，又降豫王为皇嗣。时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视昔。'"（第2844页）

[53]《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垂拱三年"条，第6447页。

[54]《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条，第6467页。

[55]《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条，第6467页。

[56]《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条："立武氏七庙于神都，

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皇后；太原靖王曰严祖成皇帝，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曰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谥，称皇后。”（第6467—6468页）

[57]《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条，第6468页。

[58]〔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882页。《沙州都督府图经》亦只因周有武王的称号，就将武与周牵强附会：“神皇圣氏，生于文王，文王之祖，生于后稷。故诗人所谓《生人》，尊祖也。于昭武王，承天剪商。谁其下武？圣母神皇。穆斯九族，绥彼四方。”（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58页。）《武承嗣墓志》也讲到武家得姓之源：“自赤乌流火，丹雀衔书。大哉，得姓之源；邈矣，承祧之绪。”（参见曹建强《唐魏王武承嗣墓志考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

[59]《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第4729页。

[60]《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条，第6468页。

[61]《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条，第6469页。

[62]《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条，第6473页。

[63]《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条，第6472页。

[64]《朝野佥载》卷一，第19页。

[65]《朝野佥载》卷一，第19页。

[66]《朝野佥载》卷三载：“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第72页）比如天授二年（691）淮南道婺州还建武义县；如意元年（692）幽州置武隆县，江南道睦州置武盛县；证圣元年（695）河南道汝州置武兴县；等等。

[67]《朝野佥载》卷一，第12页。

[68]［法］布罗代尔著，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

本主义》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67页。

[69]参见《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5页。

[70]社会学家福柯主张权力微观物理学，他认为权力的输送、渗透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表现为“毛细血管形式”，因为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肌理，触及他们的肉体，并融入他们的行为举止、话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详参［法］米歇尔·福柯著，孙淑强、金筑云译《规戒与惩罚——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71]《旧唐书》卷六二《杨恭仁附杨执柔传》，第2383页。

[72]《大唐新语》卷一，第7页。

[73]《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条，第6463页。

[74]录文参赵振华《谈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诏书和册书——以新见石刻文书为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75]参见曹建强《唐魏王武承嗣墓志考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

[76]《朝野佥载》卷二：“建昌王武攸宁别置勾使，法外枉征财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于天，吁嗟满路。为大库长百步，二百余间，所征获者贮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时荡尽。众口所咒，攸宁寻患足肿，粗于瓮，其酸楚不可忍，数月而终。”（第41页）《朝野佥载》同卷：“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华，知之时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读诗，饮泪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第31页）《朝野佥载》卷四：“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张鷟）答曰：‘三思凭借国亲，位超衮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静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第97页）《朝野佥载》卷五：“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顼父哲易州刺史，以赃坐死。顼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

王。’承嗣然之，遂犊车载入。三日不语，承嗣怪问之，二人曰：‘儿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遂进顼笼马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承嗣故也。”（第124—125页）

[77]参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1页。

[78]从上下文来看，此引文中所有的“长”，都作长短之“长”。

[79]《朝野佥载》卷四，第87—88页。

[80]张元一也以蜀马为喻讽刺过他人矮短。《朝野佥载》卷四云：“唐波若矮短，目为‘郁屈蜀马’。”（第88页）

[81]《云麓漫钞》卷三，第39页。

[82]《古代西域服饰撷萃》，第122页。

[83]《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记载：“幞头之下别施巾，象古冠下之帻也。巾子制顶皆方平，仗内即头小而圆锐，谓之内样。”（〔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5—46页。）

[84]《昭陵唐墓壁画》，第187页。阿史那忠卒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五月。

[85]《通典》卷五七《帻》引蔡邕《独断》，第1618页。杜佑解释：壮发谓当额前，侵下而生，今俗呼为“主头”者是。

[86]《隋书》卷一二《礼仪志》，第266—267页。

[87]柳宗元《龙城录》云：“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时游洛下，人呼为猴颊郎，以居常颐下有须，若猿颔也，其上有四靥。”（曹中孚点校，收入《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88]《朝野佥载》卷四：“天官侍郎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第88页）

[89]《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久视元年”条，第6544页。

[90]《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神功元年”条：“初，懿宗宽思礼于外，使诬引诸人。诸人既诛，然后收思礼，思礼悔之。懿宗自天授以来，太后数使之鞫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周、来之亚。”（第6513页）

[91]《朝野佥载》卷一：“后知微来，则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发，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第11页）

[92]《朝野佥载》卷四：“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则天大惊，引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太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钝，无意之失。’上乃释之。”（第93页）

[93]《古代西域服饰撷萃》，第87页。有的学者从形制高的角度考量，认为武家诸王样可能是受到了西域胡帽风格的影响。

[94]《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98页。

[95]《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90页。

[96]《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118页。

[97]《通典》卷六三《嘉礼八·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第1770页。

[98]《朝野佥载》“辑佚”，第178页。辑自《说郛》卷二。

[99]有关“借紫”的研究，详参陈文龙《论唐宋时期的“赐绯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十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0]关于组织的认同观念，可以参考［美］大卫·科泽撰，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23页。

[101]《通典》卷六三《嘉礼八》，第1769页。

[102]《朝野佥载》载：“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佩之。”（第178页）《愧郯录》卷四《鱼袋》载，“符瑞”是“江中鲤鱼十八子”，为唐受命之符谶说。所以，有唐一代，鲤鱼往往指代李姓皇室。（〔南宋〕岳珂：《愧郯录》，丛

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页。）

# 第二章

# 从“英王踣样”到“官样圆头巾”



武周政权随着神龙政变，又改头换面，重归李唐。五王登台的同时，武家势力也呈现衰颓之势。神龙元年（705）至景龙元年（707），朝廷中再封建的举动与议题，集中反映了当时几股政治势力瓜分权力的诉求。先是，神龙元年二月十四日，中宗有追封后父韦玄贞为上洛郡王的举动。尽管遭到左拾遗贾虚己的反对，但中宗的意志不可动摇。与追封事件相关的，是韦后报复甯承基兄弟，在礼仪层面改葬、分封家族等一系列接续的事件。[1]通过对封建的要求，也宣示了后族势力的重振。神龙、景龙政局中，韦后、安乐公主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势力，她们与皇权有离心力，但皇帝因情感、实力等复杂因素，又不得不依赖她们。

神龙元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敬晖等言诸武不当王，但中宗“又素畏太后，且欲悦安之”[2]，只是将攸暨、三思由亲王改为郡王。尽管“武诸王飨封”的举动不合人心，但中宗此时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改变武家的政治遗产。即便是削封为郡王，武三思依然是朝廷的重点防范对象，时谓：“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谶者言，‘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3]谶言的预兆固然荒诞不可信，但其既能造作，一定是因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出。以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家尽管有衰弱之趋，但毕竟还有势力。[4]韦后、安乐公主还有武三思、武崇训组成的婚姻集团，仍操纵着整个朝局。可能因为各种政治力量的左右，直至两年后的景龙元年五月，李氏诸王才得以重新分封，“侍中敬晖以唐室中兴，削武氏诸王，封宗姓为王爵，故有是命也”[5]。不过，事情真是一波三折，新近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表明，神龙年间上官婉儿曾因“韦氏侮弄国权”“欲立爱女”的政局，进行过三次极谏。[6]这样的事件疑似表明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上官婉儿也并非一牢固集团。总之，神龙政局呈现出复杂的局势。

在史书的描绘中，中宗在景龙四年（710）以前的政治表现令人诧异，不仅鲜有听从群臣关于削武抑韦的进谏，而且平日热衷于荒嬉

游宴，对于武韦的僭越举动也视而不见。史书展现的是一个荒唐并且毫无作为的皇帝形象。但是，中宗的怪异行为，有可能是他在复杂政治势力纠葛中的一种无奈之举，是一种史家认为他妥协于武韦势力所构造的“虚像”。当时朝中几乎没有一支中宗可以彻底支配的政治力量，他欲保皇位只能妥协于传统的武氏势力与新兴的后族势力。与此同时，韦后集团与武三思集团依赖“食实封”控制着国家大量财富[7]，他们凭依“墨敕”“斜封”把持吏部选举，掌控着国家的官僚系统。[8]朝中之局势，是“中宗居于虚位，武韦掌握实权”的现状。

而中宗在位期间，韦后、安乐公主的政治动向，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服饰上。作为女性，她们本不戴冠冕。[9]安乐公主的“头饰”不见于记载。不过，她的“炫耀式”着装，依然类似以往的头饰流行。史书中关于她的着装，有如下记载：

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腰，一献韦氏，计价百万。……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10]



图32 《鸟毛立女》屏风·日本天平胜宝[11]

（日本奈良正仓院藏）
此画裱褙纸张上有“天平胜宝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字样。天平胜宝四年相当于公元752年。此仕女所着鸟毛装，比起史料关于安乐公主的鸟毛装的描述，显得有些朴素。

百鸟毛裙是安乐公主的独特服饰标识，安乐公主追求华贵的奢侈消费。异样服饰，直接体现的是安乐公主的“文化品位”，而不能径直表达她的政治目的。平心而论，史料只能确切说明到此。



图33　骑马女俑·唐[12]

（金乡县主墓出土）
图中为戴鸟形头饰的骑马女俑。

不过，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他通过对上述“文化符号”的研究指出：“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一种政治的表达。”[13]前揭史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一语，表明百鸟毛裙出现、流行的时间，当值景龙二年（708）。细绎史料可以发现，景龙二年除流行过安乐公主百鸟毛裙这种夺目的着装外，韦后和武延秀也都通过“特殊的服饰”或者“服饰的特殊之处”，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诉求。

景龙元年七月李重俊发动兵变，武三思、武崇训死于格杀，武家势力大为衰颓。此时，武延秀是武家势力尚在延续的代表人物。景龙二年，武延秀复娶安乐公主，得宠于韦后，权势彰于一时。当时也出现了所谓“黑衣神孙”的谶言，预兆着武周有再兴之望：

延秀既恃恩，放纵无所忌惮。又公主府仓曹符凤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说曰："今天下苍生，犹以武氏为念，大周必可再兴。按谶书云'黑衣神孙披天裳'，驸马即神皇之孙也。"每劝令着皂袄子以应之。[14]

有关黑衣的政治预言，实源自《大云经疏》，与佛教中所谓的黑河有关。《疏》云："黑水成姓，即表黑衣，与《孔子谶》相符，名黑河也。伏承神皇幼小时已披缁服，故惟黑衣之义也。"[15]此时语谶再次兴起，和武延秀的政治动向有关。

并且，在服饰上伪造祥瑞，也成为韦后政治宣传的方式。在躲过景龙元年太子李重俊的兵变之后，韦后的革命之心愈发明显。景龙二年"春，二月，庚寅，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上令图以示百官，韦巨源请布之天下，从之，仍赦天下"[16]。



图34　绿地印花裙·唐[17]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裙绿色地，夹版印花，为典型唐裙。

权力的运作总是相似的，历史上也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韦后、安乐公主的华丽服饰，让我们不自觉想起法国18世纪七八十年代

著名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来。或许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着装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上述那段材料。

她的每款新装或者是新型发式样都受到热烈追捧，有的款式甚至是以“王后裙”来命名。在她身上，时尚、性别与政治的联系不可分。初到法国，服饰便是她不可或缺的道具。她的妆奁中服装的价值高达四十万锂，而当时一个普通贵族所拥有的服装价值大约在两千到五千锂。这是她的母亲奥地利的特丽莎女王给她置办的，为的就是给她足够的底气去面对法国王室。服饰能带来权威，就像特丽莎女王在写给安托瓦内特的信中所说那样：“它们有助于你在凡尔赛掷地有声。”[18]

研究者认为她通过服装吐露心声：

服装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用以树立自身权威的武器，表明她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小姑娘，她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来穿着、花费以及做她想做的事情。这也是她为何在她的服饰上，有很多独特创意的原因。正如口红和红色高跟鞋是贵族身份的标志一样，王后也需要用自己的风格建立她的权威。[19]

唐中宗即位伊始，政坛上最突出的两个政治人物便是韦后和安乐公主。她们的权势，通过这样的“日用品”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中宗从复位伊始，就始终处于各种势力的牵制当中。他因为情感、实力等因素，尚且没有能力完全抹去武家王朝的印记。[20]面对武韦的跋扈之举，中宗并非不知，但史书最常见的记载，就是中宗的“默然”的举措。默然实际是无可奈何的表现。景龙元年政变之后，朝中局势依然是诸种力量并存，而韦后、安乐公主力量独大。“黑衣神孙被天裳”与武延秀的应谶举动，证明武氏的力量虽然在李重俊的打击下有所衰颓，但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同时，太平公主以她特殊的

资历，在复杂的朝局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21]相王李旦也在韬光养晦。“政出多门”的畸形格局在此时还持续着。[22]中宗所能做的，就是寻求某种政治势力的捆绑，以达到制衡朝局的目的。不过，史书对中宗荒诞嬉戏的描摹以及倾向性记载，似乎遮蔽了些许中宗欲重振权力的举措。

景龙二年吏部员外郎李朝隐执破一千四百余斜封官，虽然“怨谤纷然”，但朝隐“一无所顾”。[23]想来李朝隐的人事政策，应当是获得了中宗的默许。景龙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宗开始限制食实封的数额，似乎表明了他限制武、韦的某种政治倾向。[24]景龙三年（709）起，中宗似乎有伸张皇权的欲望，无论是亲郊之举[25]，还是对韦后势力表现出的不满态度，都预示着朝局即将发生变动。景龙三年十月敕：“应食封邑者一百四十余家，应出封户凡五十四州。”将诸豪势之家的封户散配诸州，应是抑制诸封家的举动。[26]景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宗起复上官婉儿为婕妤事，似乎也反映了中宗抑制韦后的某些政治意图。[27]景龙四年（710）四月中宗曾采取“厌胜”之法，借游览之时，消除李隆基宅之龙气。[28]

虽然武家诸王样的流行状况不得而知，但由于权力构成的更替，权力的外化物——头饰也随之而变。

景龙四年三月，发生了中宗更换新帽样的举动。他在宫内宴会的场合，赏赐臣僚巾子，所谓“内样巾子”。这种巾子，他在为藩王时佩戴过，因而号称“英王踣样”，同样以爵位命名。[29]此次帽样的改动，同“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鱼袋”的变动目的一致，意图在视觉层面尽可能地恢复“李家天下”的色彩。而且，联系当时的朝局动向来说，赐样之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他伸张个人权力的策略。《新唐书》记载，中宗曾特意将帽样赐予当时的权臣宗楚客。[30]赐与受本来就带有给予与服从的含义。宗楚客是武、韦势力集团的重要爪牙，中宗这样的举动似乎颇有深意。

两个月后的景龙四年五月，朝廷中发生了两次上表斥责韦后、宗楚客谋逆的事件。第一次，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白上杖杀之。中宗的态度，史书并没有记载。第二次，中宗“虽不穷问”，但却“意颇怏怏不悦”：

（景龙四年）五月，丁卯，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上召钦融面诘之。钦融顿首抗言，神色不桡；上默然。宗楚客矫制令飞骑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楚客大呼称快。上虽不穷问，意颇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31]

但是，中宗刚刚表现出某些权力欲的时候，等待他的就是死亡。韦后与安乐公主早已在宫掖之内，安插好了自己的人手。恰在六月壬午（十九日），中宗遇到鸩杀：

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餤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32]

值得注意的是，杜佑在景龙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公主府，依旧邑司”的诏书后附有这样一段话：

时安乐公主，中宗女，恃宠骄恣，欲皇后临朝，冀得自立为皇太女，遂同谋鸩弑，既诛，废为庶人。[33]

似乎杜佑也认为停公主府事限制了安乐公主的权力，与中宗之死有所关联，因是唐中宗被鸩杀。[34]

从景龙四年三月颁赐帽样，到六月中宗崩于神龙殿，其间透露出的政治信息与逻辑联系，确实耐人寻味。韦后与安乐公主可能也从中宗颁赐帽样等一系列政治举动中，嗅到他要收回权力的气息。英王踣样在《新唐书·五行志》的记载中被视为“服妖”。《五行志》特意标注出“踣”的意思，亦表明《新唐书》的作者后知后觉地认为英王踣样是中宗亡于鸩杀、权势颠仆的象征。英王踣样的形制特点，在于幞头顶部前倾。据考古发现的同时期壁画，此种头饰确实对当时的幞头形制产生过影响，比如薛儆墓出土文物上的一些线刻人物所戴幞头，就反映了这一时尚潮流。



图35　门吏线描图·唐[35]

（薛儆墓出土）



图36　人物线描图·唐[36]

（薛儆墓出土）

此二人物所佩戴的幞头应当就是英王踣样。不过，一幞头短脚，一幞头长脚软垂。长脚幞头可能是此后玄宗推行幞的前身。



图37　乐队拍板手·唐[37]

（李邕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图中拍板手头戴踣样，巾子向前仆倒。



图38　黄袍骑手（人物全图及局部细节）·唐[38]

（李邕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骑手戴前踣式幞头。



图39　红袍骑手（人物全图及局部细节）·唐[39]

（李邕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骑手戴前踣式幞头。

随着唐隆政变，太平公主、李隆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据史料记载，太平公主也有一种叫“玉叶冠”的头饰，称名后世。[40]但在唐人礼仪观念中，女性本不应戴冠冕。《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叙及皇后之服、外命妇之服，皆是“钿钗礼衣”之制，没有冠冕。[41]李商隐《宜都内人传》云：“独大家革夫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真天子也。”[42]宜都内人虽是针对武则天“改去钗钏，袭服冠冕”而言，但由此可知不“袭服冠冕”，应是当时女性常态。这种女戴男冠的情形即便不符合制度规定，但在特殊时期也可能是一种新风尚。太平公主早年就尚男装：

久之，主（太平公主）衣紫袍玉带，折上巾，具纷砺，歌舞帝

前。帝及后大笑曰："儿不为武官，何遽尔？"[43]

这里所谓的折上巾其实就是幞头。沈括《梦溪笔谈》说："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于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44]

玉带即玉质蹀躞，用来佩戴小型佩饰。纷砺即帉帨与刀砺，佩于玉带：

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鞧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45]



图40　深斑玉带、白玉带·唐[46]

（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史书曾描述太平公主的形象，说她是"方额广颐"，也就是方额头宽下巴。武则天曾说太平公主"类己"。

太平公主的这番着装，也不禁让人想起她母亲武则天幼时的着装异闻：

则天初在襁褓，天纲来至第中，谓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召诸子，令天纲相之。见元庆、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见韩国夫人曰："此女亦大贵，然不利其夫。"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于是步于床前，仍令举目，天纲大惊曰："此郎君子龙睛凰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47]

武则天尚在襁褓，男女不辨，实不意外。但武则天的母亲给她身着男衣并让著名术士袁天纲专相其面，则表明"其母亲是用男孩子的形象来展现自己女孩的"。[48]

中国古代文化讲究"女正乎内，男正乎外"，严设男女大防。而服饰恰好是社会性别区分的重要内容，它通过不同的衣服形制在性别间制造出区别，此也划分出两性各自的价值与职责。不过，唐代女性意识勃发，被称作是"她世纪"。武则天幼时衣男子之服则预示着她成年之后将颠倒阴阳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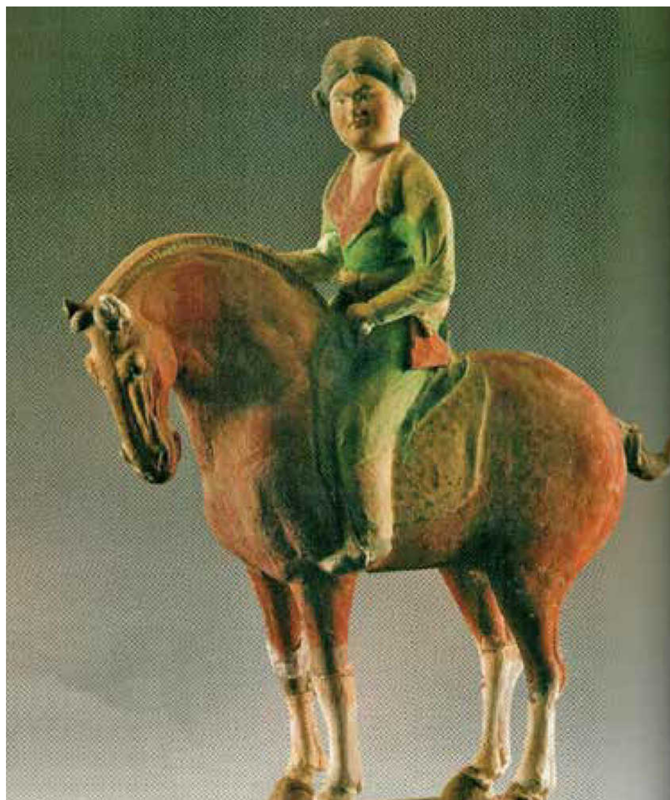


图41　彩绘胡女骑马狩猎陶俑·唐[49]

（永泰公主墓出土，陕西乾陵博物馆藏）



图42　彩绘男装女俑·唐[50]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43　《簪花仕女图》（局部）·唐

（辽宁省博物馆藏）
唐代贵族妇女的装扮应类似图中仕女。



图44-1　金筐宝钿缠枝卷莲纹金饰·唐

（金乡县主墓出土）
唐代宫廷妇女的装饰主要是钗钿之属。



图44-2　金筐宝钿缠枝卷莲纹金饰·唐

（金乡县主墓出土）



图44-3　铜钗·唐

（金乡县主墓出土）



图44-4　花钿·唐

（金乡县主墓出土）



图45　《二女伎对舞图》（局部）·唐[51]

（燕妃墓出土）

图中女伎头戴发簪。



图46　《持扇侍女图》（摹本）·唐[52]

（段简璧墓出土）

图中为头插银簪的仕女。



图47　《奏乐图》（局部）·唐[53]

（段简壁墓出土）
图中乐伎头戴钗钿。



图48　银簪·唐[54]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48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种女戴男冠的情形即便不符合制度规定，但是在唐代也是一种特殊的风尚。唐代有不少女扮男装的情形。[55]比如懿德太子墓的出土文物上就有这样的仕女图，图中仕女戴佩钗高冠。



图49　戴冠仕女线刻图·唐[56]

（懿德太子墓出土）

但是有关太平公主玉叶冠的材料不多，无法过多发覆。太平公主的势力被李隆基剿灭之后，历史进入玄宗时代。虽然开元初年玄宗并没有推行新的头饰，但他却在开元二年（714）七月连续颁布《禁珠玉锦绣敕》以及《禁奢侈服用敕》[57]，针对武、韦以来的奢侈世风进行改造。此举在移风易俗的同时，也是在肃清原有政治势力的影响。[58]

开元二年七月的《禁珠玉锦绣敕》一直贯彻到地方社会，在偏远的西州也发现了原敕断片：

1　敕：朕闻珠玉机（饥）不可▭

2　以有人▭

3　　　　　　　兵部尚书兼紫微令监修国史上柱国梁国公
□[59]

“兵部尚书兼紫微令监修国史上柱国梁国公”的签署人名应当是“姚崇”。据史籍记载，姚崇、宋璟此种改造世风的举动似乎还颇有成效：



图50　开元二年《禁珠玉锦绣敕》·唐[6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开元初，姚、宋执政，屡以奢靡为谏，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自是采捕渐息，风教日淳。[61]

直至开元中后期，玄宗才推行了新款巾子。《唐会要》云：“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62]此语意在直叙，没有多少信息可以挖掘。但旁参其他文献，罗头巾子的推行似乎还有一些政治隐衷。《封氏闻见记》载：

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处。玄宗嫌其异己，赐内样巾子，长脚罗幞头。燕公服之入谢，玄宗大悦。因此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自后巾子虽时有高下，幞头罗有厚薄，大体不变焉。[63]

“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处”，张说的服装代表当时的服饰潮流。《旧唐书》云：“开元已来，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絁为头巾、平头巾子，相效为雅制。”[64]“紫皂官絁为头巾、平头巾子”是否可能是张说引起的，尚不得而知，也不好推测。但张说的此番着装，应当与他在开元政局中所扮演的“职业文臣”角色相关。《大唐新语》对张说曾以“功业恢博，无以加矣”之词历数，可知他在玄宗营造盛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之“文臣”“儒臣”作用：

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封太山，祠睢上，举阙礼，谒五陵，开集贤，置学士。[65]

张说死后，玄宗曾为之罢停元会，看似优待异常。但《大唐新语》只叙述了玄宗褒崇张说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玄宗对他忌惮、防范的一面。

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升迁为中书令，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侵夺了六部的权力。[66]同时，张说还把握着集贤院，以文儒领袖称名于世。[67]此时，张说的权力欲极强，中书侍郎崔沔有所不从，便被他出为刺史。[68]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利用宇文融的密奏，针对吏部“十铨”的改革，很可能就是对张说宰相势力的限制。[69]开元十四年（726）四月，玄宗利用宇文融、崔隐甫对张说的弹劾，取消了张说的中书令一职。[70]幸由高力士美

言，张说才得以保住右丞相的位置。[71]并且，此时围绕武惠妃立后的问题所出现的舆论，又皆不利张说。[72]玄宗不立武惠妃为后，固然与所谓和武氏的“不共戴天之仇”有关，进而防微杜渐。但是，防止张说东山再起，恐怕亦是一不可忽视的缘由。

按照《资治通鉴》所记，开元十六年（728）“二月，壬申，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说兼集贤殿学士。说虽罢政事，专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73]。虽云“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但以致仕之身，只是聊备顾问尔。

综而观之，玄宗不仅在行政系统中对张说的限制、贬斥颇多，就是在服饰等细节处，玄宗也不容张说的服饰有稍许僭越。

按上引《封氏闻见记》云：“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开元中”为约略的时间，可能指张说开元十一年升任中书令之后，到开元十六年致仕之前的时期。“冠服以儒者自处”，当指张说集贤殿学士的身份。当张说的着装“冠服以儒者自处”时，玄宗就“嫌其异己”，转而要赐张说“内样巾子”（长脚罗幞头）。这种举措，可能与开元十三年以来玄宗在行政系统中对张说的限制是一致的。直至“燕公服之入谢”，玄宗才“大悦”，并以此为契机“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如是命令，毫无疑问也是在要求臣僚顺从，是宣示帝王权威的重要措施。

张说卒于开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因此长脚罗幞头的颁行时间，应当不在开元十九年（731）。[74]而且，就常理而言，开元十六年，张说已经致仕，权势早已旁落，此时已经不至于对玄宗构成威胁。所以玄宗赐张说内样巾子的事件，是否有可能发生在开元十六年之前？如果是这样，《唐会要》所云“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又当如何理解？

按照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衣冠异制》所记，似乎罗头巾子与官样圆头巾子的颁行并不在同一时间：

开元间，始易以罗，又别赐供奉官及内臣圆头宫（官）朴（样）巾子。[75]

“始易以罗”，可能是指张说开元十一年升任中书令之后，到开元十六年致仕之前的某一时期。玄宗针对张说的着装，颁赐“长脚罗幞头”；“又别赐供奉官及内臣圆头宫（官）朴（样）巾子”，是指开元十九年十月玄宗又向“供奉及诸司长官”颁赐“宫（官）样圆头巾子”。《唐会要》可能未作区分，将二者合二为一。《云麓漫钞》云：“明皇开元十四年，赐臣下内样巾子。”[76]虽然成书时间在后，但据以上考订，此处的“开元十四年”很有可能是长脚罗幞头的颁行时间。这种长脚罗幞头却因玄宗的推行，流行于开元中期，同时期的壁画就有所反映。



图51　供养人像（临摹）·唐[77]

（莫高窟130窟）

图中供养人所戴即为长脚罗幞头。



图52-1　《乐队图》·唐[78]

（苏思勖墓出土）

图中乐手戴长脚罗幞头。



图52-2　《步行仪仗队》·唐[79]

（李寿墓出土）
图中人物戴长脚罗幞头。

事实上，针对张说着装的限制，只是开元政局中玄宗对宰相种种限制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张说的特殊头饰在于塑造一种“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那么，玄宗之长脚罗幞头，或可视为对此类奇装异服的反制：一方面以统一的装扮压制立异者，使之丧失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是以统治者的威权去干预“品位”，也就是要争夺服饰文化的“表现权”。



图53　《红衣男装仕女图》·唐

（武惠妃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中人物戴长脚罗幞头。

大概古今中外的帝王，不会允许臣僚在服装方面有独特创造。要理解玄宗的这番举动，我们可以看看时代稍近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太阳王路易十四就非常善于将奢华与庄严作为王权形象的投射。在宫廷舞会上，他将自己扮演成阿波罗或者罗马帝王，以此来树立一种彼得·伯克称之为“光彩夺目”的个人形象。整个王室和宫廷追随其后。……如果他发现哪位贵族没有按身份地位穿衣，他会非常生气。因为在他的宫廷里，所有人的服饰必须与身份匹配。[80]

服饰能带来权威。无论是唐玄宗还是路易十四，他们对于服饰的关注都表明，凡是想建立自己权威地位的帝王，甚至在服饰层面也不许他人有稍许僭越。

文献记载的只是有关张说着装的片段。如果说服装带有政治人物“自我表演”与“彰显身份”的功能的话，那么，日常社会中的“观者”能从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身上捕捉到什么呢？

开元天宝之际，“东城老父”就是这样一个很有特色的观察者。当时社会当中很多政治人物“服用”的缯布、绮縠、锦绣等信息，都曾映入过他的眼帘：

（东城老父）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蓟州庸调缯布，驾轊连軏，坌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81]

遗憾的是，有关张说的具体着装，没出现在东城老父的自述当中，但在开元天宝之际的长安城中，老父应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意无意间捕捉着这些信息。当时社会当中文与武的遽变、升平与动乱的置易、胡风与汉俗的改换[82]，东城老父都通过对“服饰”的观察，有着敏锐的判断。东城老父曾经在街道上通过“首饰靴服之制”看到了胡风，表达他对长安少年有“胡心”的担心：

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83]

老父的这种观察符合唐人对安史之乱前后"贵游士庶"的服装的描述。

《旧唐书》记载：

武德来，妇人着履，规制亦重；又有线靴。开元来，妇人例着线鞋，取轻妙便于事，侍儿乃着履。臧获贱伍者皆服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84]

天宝中，杨贵妃、杨国忠家族崛起，是政坛内外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他们的社会地位由"细微之家"到"椒房之亲"的转变，依然外化在服饰上。《明皇杂录》云："杨贵妃尝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85]



图54　假发髻·唐[86]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其形制以麻布为衬里，用棕毛缠绕在麻布上，再经过染色处理制成。现为棕黑色，呈螺旋状，工艺精细匀称。其使用方法是将头发束至顶部后，再将发套扣在其上，用簪子固定。



图55　橙黄色印花绢裙·唐[87]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童谣固是对于马嵬坡事件已知结果倒放电影式的回顾，将奇特的首饰、服饰看作是权力顿摧的预兆。不过，安史叛乱之前的长安城中，杨国忠家族的“炫耀性”着装，确是他们权势的直观展现。据《明皇杂录》载：

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88]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条，对杨氏家族出行的场景有更细致的描述：

三夫人（三夫人，韩、虢、秦也）将从车驾幸华清宫，会于国忠第；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华夺目。国忠谓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杨氏五家，队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队，粲若云锦；国忠仍以剑南旌节引于其前。[89]

所谓“贵妃姊妹”即指“韩、虢、秦”三国夫人，她们随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得宠。白居易诗歌说：“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记载：

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90]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如是描绘三姐妹：

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台省、州县奉请托，奔走期会过诏敕。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91]

杨氏姐妹的宅邸位于宣阳坊，离兴庆宫较近。据说她们姐妹三人屋瓦可以连成一片。杨国忠也住于是坊，这就是为什么说，她们在前往华清宫时，可以会聚于“国忠第”。

引文言杨氏家族出行时“炳炳照灼，观者如堵”，这样的用词可能并非虚夸。当时身处长安，形形色色的人员，在大部分时间里，可能正是通过这样的日常观察，体味到权势的气息。映入他们眼帘的可能就是“粲若云锦”的服饰。

比如诗人杜甫就曾经在三月三日上巳节看到了出行的杨家车队。

《丽人行》云：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

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92]



图56　侍女俑·唐[93]

（西安博物院藏）



图57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张萱

（宋代摹本，辽宁省博物馆藏）

搅动大唐盛世格局的安禄山的头饰是怎样的呢？《安禄山事迹》透露出一些信息。在安禄山起兵叛乱前，他“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

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94]。

安禄山身材肥胖[95]，身着胡帽、胡衣、胡靴，他擅长跳胡旋舞，常常往来于长安与河北之间。《安禄山事迹》说他“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96]。这说明安禄山乘骑于道，所着“胡服”一定会让路旁的观者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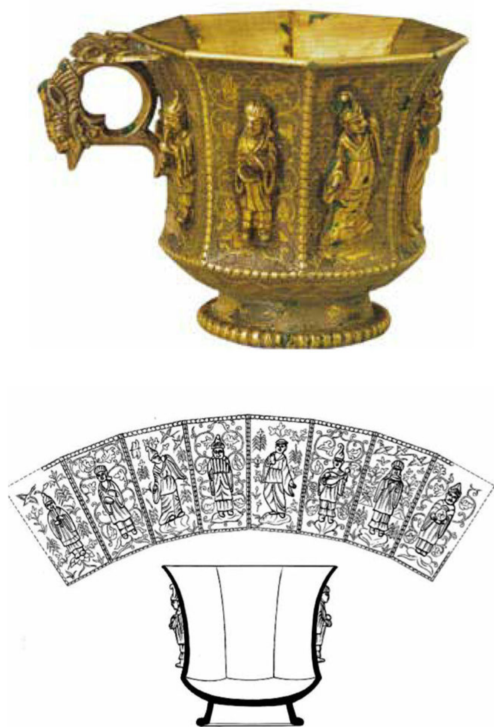


图58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原物及纹样线描）·唐[97]

（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杯上刻有胡人乐舞图。



图59 《胡腾舞图》·唐[98]

（苏思勖墓出土）

史籍记载安禄山擅长跳胡旋舞。白居易《胡旋女》诗云：“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图60　《乐舞图》·唐[99]

（韩休墓出土）
壁画中间一男一女疑似在跳胡旋舞。

等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史家遂认为胡服流行已经预示了这场动乱。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说：“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100]史书中有关安禄山的描述，不禁让人想起唐代胡俑形象。







图61　彩绘胡人骑马陶俑及其局部·唐[101]

（张士贵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骑马胡俑满脸络腮胡，身着胡帽、胡服、胡靴，面相狡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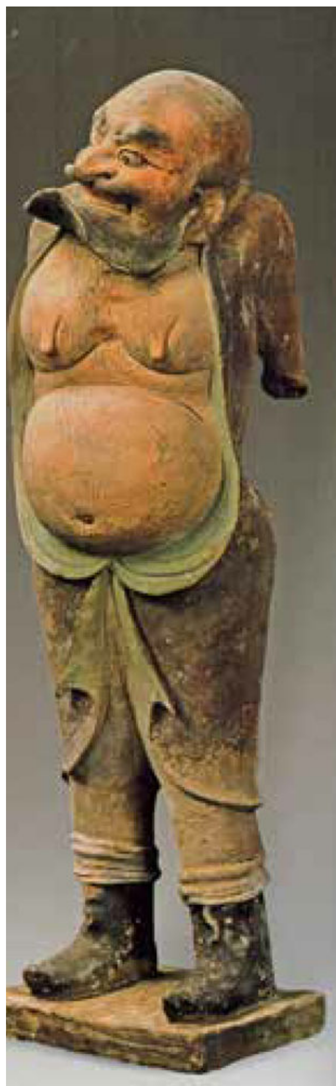


图62　胡人陶俑·唐[102]

（甘肃省庆城县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据《安禄山事迹》记载，“禄山腹大，每着衣服，令三四人擎腹，猪儿头戴之，始得系衣带。玄宗赐禄山华清宫浴，猪儿得入宫与禄山解着衣裳”[103]。这个胡人俑的特点即是大腹便便，可以推想安禄山的形象。

---

[1]《朝野佥载》辑佚自《通鉴》：“韦氏遭则天废庐陵之后，后父韦玄

贞与妻女等并流岭南，被首领甯氏大族逼夺其女，不伏，遂杀贞夫妻，七娘等并夺去。及孝和即位，皇后当途，广州都督周仁轨将兵诛甯氏，走入南海。轨追之，杀掠并尽。韦后隔帘拜，以父事之，用为并州长史。后阿韦作逆，轨以党与诛。”（第171页）《册府元龟》卷三〇三《外戚部》：“韦玄贞，中宗皇后父也，为豫州刺史。卒，神龙元年追赠上雒郡王，左拾遗贾虚己谏之，疏不纳。九月诏令改葬玄贞，其仪准太后父太原王故事。初，帝迁于房陵，玄贞坐配流钦州，死。后母崔氏为钦州首领甯承基兄弟所杀。玄贞有四子洵、浩、洞、泚等时亦死于容州。至是，制遣使迎玄贞及崔氏丧柩，归于京师。赠赙甚厚。又遣广州都督周仁轨率兵二万，斩讨甯承基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又追赠洵吏部尚书、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卫尉、淮阳郡王、泚太仆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丧柩归葬于京师。及将至，帝与后幸长乐宫望丧而泣。……二年四月，又改赠玄贞为丰王，仍号庙曰褒德，陵曰荣光，仍各置官员，并给户一百人守卫洒扫。五月再追赠玄贞为太师、雍州牧，并益州大都督。伯父赠太常卿，玄俨为特进、荆州大都督，封鲁国公，追封从祖伯父十余人皆为上州刺史，仍赠爵郡公。”（〔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572—3573页。）

[2]《新唐书》卷二〇六《武承嗣传》，第5838页。

[3]《朝野佥载》卷四，第12页。

[4]详参唐华全《试论唐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5]《唐会要》卷四六《封建》，第957页。

[6]墓志参见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

[7]参见［日］砺波护《隋の貌閲と唐初の食実封》，《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68年，第249—291页。

[8]参见［日］谷川道雄《武后朝末年より玄宗朝初年にいたる政事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956年第14卷第4号。谷川先生在此篇文章中，概述以往的唐代政治史研究表现出的两种观点，即否定贵族势力的新阶级确立于武周时期和认为贵族势力在唐代后半期依然顽强残存。相当于两者中间期的玄宗登基时，宫廷政治史的基调，是依靠皇帝权力谋求扩大自己势力的宠

臣、外戚、皇亲势力，与希望皇帝恢复亲政的新兴势力之间的对立。经过中宗、睿宗时期的党争，两者的矛盾趋于缓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开元初期的宫廷政治。谷川先生的意见很具启发性。但事实上，我们认为宠臣、外戚、皇亲势力，以及希望皇帝恢复亲政的新兴势力，这样的二分法对于复杂的政治局势来说，未免有点简单。独立于两种势力之上的是皇权，只要不威胁到皇权本身，皇帝会依赖其中的一种力量。一旦某种力量威胁到皇权本身，就可能面临皇权与另外一种力量的结合。

[9]《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考异》引李商隐《宜都内人传》云："独大家革夫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动，真天子也。"（第6502页）宜都内人虽是针对武则天"改去钗钏，袭服冠冕"而言，但由此可知不"袭服冠冕"，应当是当时女性常态。《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叙及皇后之服、外命妇之服皆是"钿钗礼衣"之制，没有冠冕。（〔唐〕李林甫等编，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7-119页。）

[10]《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77页。

[11]日本宫内厅藏版，正仓院事务所编：《正倉院宝物北倉（增補改訂）》，东京：朝日新闻社，1989年。

[1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王自力、孙福喜编著：《唐金乡县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图版59。

[13]［美］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页。

[14]《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秀传》，第4734页。《新唐书》卷二〇六《武延秀传》记事略同："三思死，韦后复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仓曹参军何凤说曰：'今天下系心武家，庶几再兴。且谶曰黑衣神孙被天裳，神孙非公尚谁哉？'因劝服皂衣惑众。"（第5839页）

[15]参见林世田《〈大云经疏〉结构分析》所录《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郑炳林等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16]《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条，第6619页。《旧唐书》卷九二《韦巨源传》："景龙二年，顺天翊圣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

而方歇，巨源以为非常佳瑞，请布告天下，许之。”所论与《通鉴》同。但《新唐书》卷七六《韦皇后》云：“五色云起后衣笥。”（第3486页）《旧唐书》卷五一《中宗韦庶人》云：“宫中希旨，妄称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两《唐书》未言“裙上”。按《册府元龟》卷八〇《帝王部·庆赐》：“二年二月，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帝令画工图其状，以示百寮，仍大赦天下。”（第928页）《册府元龟》卷八四《帝王部·赦宥》：“二年二月庚寅，顺天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帝令画工图其状，以示百寮，乃大赦天下。”（第996页）《册府元龟》卷三三九《宰辅部·邪佞忌害不忠邪佞》：“韦巨源，中宗时，为尚书左仆射，韦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巨源以为非常嘉瑞，请布告天下许之。”（第4007—4008页）三处均言“裙上”。一般认为《册府元龟》的史料来自《唐实录》《国史》，较两《唐书》更为原始，故此处取其说法。

[17]《古代西域服饰撷萃》，第106页。

[18]《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第48页。

[19]《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第48页。

[20]虽然武则天此时身处上阳宫，但她仍然有一定的政治威望。《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元年”条：“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出为亳州刺史。”（第6584页）“上数微服幸武三思第，监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谏曰：‘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犹有附会；周之旧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轻有外游，不察豫且之祸！’上泄之，三思之党切齿。”（第6587页）武三思之所以还能职掌大权，非独靠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的婚姻利益集团。此时身处西宫的武则天，依然是能影响朝政的势力之一。同卷《考异》引《统纪》曰：“太后善自粉饰，虽子孙在侧，不觉其衰老。及在上阳宫，不复栉颒，形容羸悴。上入见，大惊。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上悲泣不自胜，伏地拜谢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谋。”（第6591页）

[21]《旧唐书》卷一八三《太平公主传》：“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

以则天所生，特承恩宠。初，永隆年降驸马薛绍。绍，垂拱中被诬告与诸王连谋伏诛，则天私杀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宫禁严峻，事不令泄。公主亦畏惧自检，但崇饰邸第。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永淳已前朝制，亲王食实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出降三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太平食汤沐之邑一千二百户，圣历初加至三千户。”（第4738页）景龙二年前后，太平公主、相王是制衡韦后、安乐公主的重要力量。本传又载：“景龙二年，公主男崇简、崇敏、崇行，同授三品，与渔阳王兄弟四人同制。时中宗仁善，韦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公主日益豪横，进达朝士，多至大官，词人后进造其门者，或有贫窘，则遗之金帛，士亦翕然称之。”（第4739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九《考异》引《景龙文馆记》：“时太平、安乐二公主以亲贵权宠，各立党与（疑为羽），阴相倾夺，爰自要官宰臣皆分为两。时太平尤与宗不善，故讽琬以弹之。”（第6632页）从授太平公主三男三品位阶的举动来看，中宗似乎有同太平公主结合的趋势，韦后、安乐公主深为忌惮。（参见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2—276页。）而褚文哲曾尝试以新文化史的方法，解读史书中的李显形象。（参见氏著《制作李显——两〈唐书·中宗本纪〉文本中的荒唐帝王书写》，《社会/文化史集刊》第3辑，台北：时英出版社，2010年，第239—259页；《制作李显——〈资治通鉴〉文本中的苦命王子·缺能帝王书写》，《社会/文化史集刊》第4辑，台北：时英出版社，2010年，第151—200页。）

[22]以往关于景龙政局的研究，可能过于把目光投向武、韦。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局中，众多外戚都占有一席之地，只是武、韦的势力最大而已。《通典》卷一九《职官典》：“景龙中，有太平、安乐、长宁、宜城等诸公主及皇后陆氏妹郕国夫人、李氏妹崇国夫人并昭容上官氏与其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陇西夫人赵氏，皆树用亲识，亦多猥滥。或出自臧获，或由于屠贩，多因赂货，累居荣秩，咸能别于侧门降墨敕斜封以授焉，故时人号为‘斜封官’。时既政出多门，迁除甚众，自宰相至于内外员外官及左右台御史，多者则数逾十倍，皆无厅事可以处之，故时人谓之‘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第472—473页）

[23]《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第6625页。

[24]《开元户部格残卷》，录文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

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6页。

[25]金子修一研究过皇帝亲郊与有司摄事两种情况，他指出皇帝亲郊状况，一般都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之后，或者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详参氏著《唐後半期の郊庙親祭について—唐代における皇帝の郊庙親祀その（3）—》，《東洋史研究》1996年第55卷第2号，第75—109页；《唐代皇帝祭祀的特质——透过皇帝郊庙亲祭来检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62—473页。另外，金子修一先生在《论唐太宗—睿宗的郊庙亲祭——唐代皇帝的郊庙亲祭（一）》一文中指出，中宗此次的郊祀，有可能是按照韦后意志举行的。（文载《中国的都市和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第249—252页。）笔者则认为此次郊祀的主导者应当是中宗，最终郊天的初献、亚献、终献的人员是权衡诸种势力后的结果，比如安乐公主最终没有承担终献，就是这种权衡的表现。

[26]《册府元龟》卷五〇五《邦计部·俸禄第一》，第6069页。

[27]〔宋〕宋敏求辑：《唐大诏令集》卷二五《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1页。

[28]《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属中宗末年，王室多故，上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上所居宅外有水池，浸溢顷余，望气者以为龙气。四年四月，中宗幸其第，因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第165—166页）

[29]《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景龙四年三月内宴，赐宰臣已下内样巾子。其样高而踣，皇帝在藩时所冠，故时人号为'英王踣样'。"（第675页）

[30]《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第879页。

[31]《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睿宗景云元年五月"条，第6641页。

[32]《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睿宗景云元年六月"条，第6641—6642页。

[33]《通典》卷三一《历代王侯封爵》，第870页。

[34]黄永年先生认为中宗可能是因病而死，中宗的存在对韦后干政并无妨碍，参见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但是这种看法可能有些主观。综合当时朝局中的各种现象来

看，中宗想要恢复皇权的作为，是致死的重要原因。

[3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36]《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第51页。

[37]《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第320页。

[38]《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第325—326页。

[39]《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第323—324页。

[40]《明皇杂录》卷下："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唐〕郑处诲撰，田廷柱点校：《明皇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9页。）

[41]《唐六典》，第117—119页。

[42]《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考异》引《宜都内人传》，第6502页。

[43]《新唐书》卷八三《太平公主传》，第3650页。

[44]〔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一《故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45]《梦溪笔谈校证》卷一《故事》，第23页。

[46]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07、212页。

[47]《旧唐书》卷一九一《袁天纲传》，第5093—5094页；又见《大唐新语》卷一三《记异》，第193页；《太平广记》卷七六"袁天纲"条，第479—480页。

[48]参考荣新江《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

[49]《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48—49页。

[50]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陶俑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

[51]《昭陵唐墓壁画》，第172页。

[52]《昭陵唐墓壁画》，第174页。

[53]《昭陵唐墓壁画》，第174页。

[54]《古代西域服饰撷萃》，第123页。

[55]《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第723—750页。

[56]原线刻图图版参见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此据《唐代薛儆墓石椁及其线刻人物考察》所绘线描图，见《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第93页。

[57]《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禁约上》，第562—563页。

[58]《朝野佥载》卷三载："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禁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物，于是采捕乃止。"（第71页）

[5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0页。整理者认为："本件首句与《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所载唐开元二年七月《禁珠玉锦绣敕》首句相合。《旧唐书·玄宗纪上》云："开元元年十一月梁国公姚元之（姚崇）为兵部尚书，二年春正月为紫微令，与本件押署亦相符合。"

[60]《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80页。

[61]《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77页。

[62]《唐会要》卷三一《巾子》，第675页。

[63]《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巾幞》，第46页。

[64]《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第1954页。

[65]《大唐新语》卷一《匡赞》，第10页。此段记述同见于《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第3057页），文字略有不同。

[66]《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一年”条：“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第6758页）

[67]《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一年”条，第6756页。

[68]《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二年”条，第6760页。

[69]在朝中用人一途，张说的建议干涉到玄宗的选择。《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一年”条云：“上召河南尹崔隐甫，欲用之，中书令张说薄其无文，奏拟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素与说善，说荐为御史大夫；上不从。丙辰，以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丁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由是与说有隙。”（第6771页）另外，通过封禅，张说多超迁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官阶入五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四年”条载：“张说多引两省吏。及以所亲摄官登山。礼毕推恩，往往加阶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书舍人张九龄谏，不听。又，扈从士卒，但加勋而无赐物，由是中外怨之。”（第6766—6767页）

[70]《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四年”条，第6771页。

[71]《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四年”条，第6771—6772页。

[72]《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四年”条，第6772页。

[73]《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六年”条，第6782页。

[74]《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云：“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薨，时年六十四。”（第3056页）

[75]〔宋〕郭若虚撰，王其祎点校：《图画见闻志》卷一《论衣冠异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页。

[76]《云麓漫钞》卷三，第39页。

[77]段文杰著，敦煌研究院编：《敦煌之梦》，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

[78]《大唐壁画》，第89页。

[79]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图版5。

[80]《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第47—48页。

[81]《太平广记》卷四八五《东城老父传》，第3994页。

[82]《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服妖》："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第879页）

[83]《太平广记》卷四八五《东城老父传》，第3995页。

[84]《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第1958页。

[85]《明皇杂录》"辑佚"，第64页。

[86]《古代西域服饰撷萃》，第123页。

[87]《古代西域服饰撷萃》，第106页。

[88]《明皇杂录》卷下，第29页。

[89]《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条，第6920页。

[90]《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第2178页。

[91]《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第3493页。

[92]《全唐诗》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6页。

[93]《环肥燕瘦——汉唐长安丽人行》，长沙博物馆特展资料，第6页。

[94]〔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3页。

[95]安禄山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见，玄宗戏之曰："朕适见卿腹几垂至地。"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风。尝夜晏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龙也，无能为者。"禄山乘驿马诣阙，每驿中闲筑台以换马（谓之大夫换马台），不然马辄死。驿家市禄山乘马，以五石土袋试之，能驮者，乃高价市焉，饲以候禄山；鞍前更连置一小鞍，以承其腹。禄山肉疾转甚，富贵之已极。每朝，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

而方进，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安禄山事迹》卷上，第77页。）

[96]《安禄山事迹》卷上，第77页。

[97]《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第81页。

[98]《大唐壁画》，第88页。

[9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西安郭庄唐代韩休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1期。

[100]《安禄山事迹》，第107页。

[101]《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48—49页。

[102]《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106页。

[103]《安禄山事迹》，第108页。

# 第三章

# 从“山子军容头”到“五代僭越样”(1)



开元天宝之际的浮华，也随着安史之乱遽然消逝。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帽样依然随时而变。裴冕属灵武元从之首，当初极力劝进肃宗即位，他的资历、权势在外朝士大夫中首屈一指。与此同时，社会就开始流行所谓的“仆射样”[2]。

根据《封氏闻见记》的记载，安史之乱后还流行过以下几种幞头：

近日长安尉程李家好高巾，不曾改换。[3]

御史陆长源性滑稽，在邺中忽裹蝉翼罗幞尖巾子。或讥之，长源曰：“若有才，虽以蜘蛛罗网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无才，虽以卓琰子裹一簸箕，亦将何用？”[4]

著名的刘晏所戴头饰也别具一格，他的幞头脚有自己的特点：

先时，吏部尚书刘晏裹头至慢，每裹但擎前后脚攦两翅之，都不抽挽。或曰：“尚书何不抽两翅？”晏曰：“两边通耶！”时人多哂之。[5]

史料的意思是，刘晏在裹头时并不抽出幞头脚，可能类似壁画中侍卫所戴样式。



图63　喂鸟侍女·唐[6]

（韦浩墓出土）
图中人物戴没有抽脚的幞头。

严武出身行伍。他二十岁便调补太原府参军事，后被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而他的幞头在裹挟时，也颇具风格。

兵部尚书严武裹头至紧，将裹，先以幞头曳于盘水之上，然后裹之，名为水裹，㩓两翅皆有褶数，流俗多效焉。[7]

兵部尚书严武裹头至紧，应当与他日常生活中的形象相配。《旧唐书》说严武“神气隽爽，敏于闻见。幼有成人之风，读书不究精义，涉猎而已”[8]。

唐德宗的头饰不见记载。不过他针对节度使、观察使所进行的袍服改革，也体现出他的政治意图。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曾赐节度、观察使等新制时服。他说："顷来赐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节度使文以鹘衔绶带，取其武毅，以靖封内；观察使以雁衔仪委，取其行列有序，冀人人有威仪也。"[9]

要理解贞元七年唐德宗赐服事件，还是应该将此事放在贞元前后的时代背景中来看。中央与藩镇的博弈、妥协、斗争，始终是德宗一朝的政治主题。人们的直观印象是，德宗在奉天之难后意志消沉，对待藩镇务为姑息：

德宗惩奉天之难，厌征伐之事，戎臣优以不朝。终老于外，其卒则以幕吏将校代之，两河藩镇或仓卒易帅，甚于弈棋。[10]

但细究这种看法，其起源可能是《资治通鉴》所记杜黄裳的一段话：

上（唐宪宗）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旌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11]

然而稍检史籍，就会发现贞元年间的诸多史事并不支持杜黄裳的这种看法。在对待河北之外的藩镇时，唐德宗的态度其实依旧强硬，企图建造一种中央与藩镇的新秩序。在对待以首都长安为圆心的外围西北、运河沿线的藩镇节帅的态度上，唐德宗决不允许这些藩镇以下犯上、自立节帅。[12]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之后，引人注目的头饰是裴度的"毡帽"。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称留后。宪宗在主战的丞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等人支持下，决心以武力讨伐，

这场讨伐吴元济的战争成为中央与割据藩镇的决战。

各个藩镇中，支持吴元济的主要是淄青、成德，他们暗中派人焚烧河阴转运仓（今河南荥阳东北），并刺杀武元衡及裴度，武元衡身亡，裴度幸免于难。

裴度幸免于难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头戴毡帽：

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疮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居三日，诏以度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3]

两《唐书》说裴度幸免于难的原因是“带毡帽”，表明这种毡帽起到了防护作用。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毡帽究竟是怎样的呢？

毡帽见于唐代“军防令”：

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镢、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14]

但根据《资暇集》记载，裴度所戴的这种毡帽与一般军士所戴不同，应当是从“席帽”改造而来的：

永贞之前，组藤为盖，曰“席帽”，取其轻也。后或以太薄，冬则

不御霜寒，夏则不障暑气，乃细色罽代藤，曰“氈（毡）帽”，贵其厚也。非崇贵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晋公之为台丞，自通化里第早朝。时青、镇一帅拒命，朝廷方参议兵计，而晋公预焉。二帅俾捷步张晏等，傳刃伺便谋害。至里东门，导炬之下，霜刃欻飞。时晋公繄帽是赖，刃不即及，而帽折其檐。既脱祸，朝贵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皆戴焉。折檐帽尚在裴氏私帑中。太和末，又染缯而复代罽，曰“叠绡帽”，虽示其妙，与氈帽之庇悬矣。会昌已来，吴人炫巧，抑有结丝帽若网。其巧之淫者，织花鸟相厕焉近又染藤为紫，复以轻相尚。[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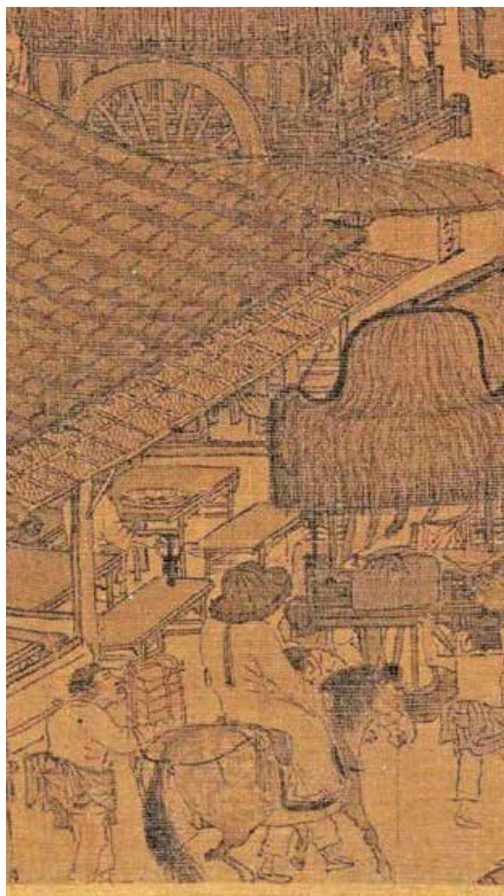


图64　《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骑在马上的人物所戴为带檐席帽。

罽为毛织物，被用于席帽改造。正是因为利用这种材料，使得席帽厚重。元和十六年（821）六月，长安应热气蒸腾，裴度戴这种皮质毡帽，目的应当是障暑气。不过，这种材质厚重的毡帽意外地起到防护作用，遂使“朝贵乃尚之”。朝贵崇尚表明毡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成了“安全帽”，成了京城流行的头饰。这种头饰在抵挡刀刃时曾“帽折其檐”，则透露出此帽有帽檐。可能因为护命有功，裴度所戴“折檐帽”后来一直保存在“裴氏私帑中”。因此孙机先生推测，这种帽的形制，类似《清明上河图》中的带檐席帽。

如果毡帽的流行与唐宪宗元和年间勠力削藩、重建中央权威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那么，“军容幞头”的流行则与中晚唐宦官专权出现密不可分。[16]

肃代之际，权阉鱼朝恩的头饰军容幞头，流行一时。《朱子语类》云：

唐人（应当是开元之后）幞头初止以纱为之，后以其软，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衬起，名曰“军容头”。其说以为起于鱼朝恩，一时人争效。士大夫欲为幞头则曰：“为我斫一军容头来。”及朝恩被诛，人以为语谶。[17]

朱熹所谓“其说”，必有所据。所谓“山子军容头”，应是在鱼朝恩充当“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之后出现的。司马光曾比较汉、唐宦官专权异同，认为“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18]，一语道破唐代宦官专权的原因。

乾元元年（758）九月二十一日，肃宗李亨派遣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九大节度使，共集结步

骑兵二十多万人，向驻守在邺城的安庆绪发动进攻，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可令人费解的是，肃宗李亨并没有设置元帅节制规模庞大的军队，而是设置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由鱼朝恩担任。史谓：“观军容之名自此始。”[19]这样的设置恐怕还是担心郭子仪、李光弼等坐大，重蹈安史覆辙。此后，鱼朝恩权力最鼎盛时的官职均以“观军容”称名，宦官也由此开始掌握军政大权。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由泾州进犯长安，唐代宗仓皇逃往陕州。当时六军逃散，一时难以召集。仓皇逃难之际，鱼朝恩率驻陕州军及神策军奉迎，军威方振。职是之故，唐代宗对鱼朝恩倍加宠信，任他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典神策军，权宠一时。[20]流行头饰“军容头”可能就是这种权势的视觉展现。此后“军容”也如同敕使成了宦官的象征符号。



图65　宦官俑·唐[21]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宦官俑高34.5厘米，头戴黑冠，身穿黄色菱格纹绮长袍，腰佩黑色纸带，脚穿乌靴，翘嘴瞪眼，横眉斜竖。展览者认为这样的造型体现了宦官的阴险狡诈。

士大夫欲为幞头，则曰“为我斫一军容头来”这样的发泄之语，大致折射了当时外朝士大夫对宦官鱼朝恩的不满。在鱼朝恩被诛后，“斫军容头”的泄怒之语，被视作鱼朝恩权力瓦解的预兆。

《北梦琐言》卷五《令狐公密状木团头附》，将军容头与宦官的势力崩摧编为一篇，显示出此种以使职命名的头饰确是当时宦官权势的写照。文云：

唐太和中，阉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祸，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权，末年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虑其冤，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后为宦者所见，于是南北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已。乾符后，宫娥皆以木团头，自是四方效之，唯内官各自出样，匠人曰：“斫军容头、特进头。”至是果验也。[22]

晚唐宦官操纵神策军，自是皇帝废立全在其手。《新唐书》称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殆非虚言。宦官、皇帝、外廷官僚最激烈的冲突就表现在唐文宗太和年间的“甘露之变”。武宗上台之后，治仇士良、鱼弘志之罪，才标志着元和以来宦官操纵政局的时代结束。[23]不过，宣宗大中初期，拥立宣宗的新宦官群体又立刻重掌了军政要职。大中中期，新兴权阉飞扬跋扈，宣宗又开始利用外朝官僚限制宦官权势。至是南衙北司的斗争，如相水火。直至唐亡，宦官操纵中枢政局的时代才彻底结束。

唐僖宗乾符初（874），由教坊内教头创造了一种新头饰。程大

昌《演繁露》载：

至昭宗乾符初（乾符是僖宗年号，此显误），教坊内教头张口笑者，以银捻幞头脚上簪花钗，与内人裹之。上悦，乃曰："与朕依此样进一枚来。"上亲栉之，复揽镜大悦。由是京师贵近效之。[24]



图66　《散乐图》（局部）·辽[25]

（宣化辽墓出土）
图中乐手幞头上插花钗，可能类似张口笑所造。

这种"银捻幞头脚上簪花钗"构造复杂，需要悉心整理。到乾符后期（乾符五年，878），银捻幞头显然已不适应时局。

皇帝、宫女、宦官在黄巢起义等唐末大乱的风潮里朝不保夕，需要随时出逃，无暇像乾符初一样对着镜子打扮。此时，宫女又发明了不用"如平时对镜系裹"的木团头。唐僖宗十分喜爱，故使用木团头，因"缓急之便"，随时脱戴。此种木团头也是"四方效仿"。[26]但有例外者，就是宦官、军士。宦官坚持"各自出样"，仍然被称作"军容头"。

此种军容头恐怕是当时田令孜、杨复恭等宦官权力的视觉象征。[27]另外，军人们也佩戴独特的帽式："乾符五年，洛阳人为帽，皆冠军士所冠者。"[28]皇帝、宦官、军士所引发的不同时尚潮流，大致反映了晚唐社会的各种主要政治势力的影响。

光化年间，南衙宰相崔胤与昭宗谋图诛尽宦官，引起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等人的警觉。他们欲以李茂贞、韩建为军事奥援，想要再兴废立之事。光化三年（900）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矫诏令太子李裕嗣位，拉开南衙北司互相援用军阀火并的序幕。

次年初，与朱温关系密切的宰相崔胤与护驾都头孙德昭等杀刘季述，使宦官势力遭到了一次重大打击。随即昭宗复位，改年号为天复。

此后，崔胤想借朱温之手进一步诛杀宦官，而韩全诲等宦官为谋图自保，再次将砝码押给了长安西边的军阀李茂贞。这年十月，崔胤矫诏令朱温带兵赴京师，朱温乘机率兵由河中攻取同、华二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华州区），将军事势力直插唐王朝的统治中心。见势不妙，韩全诲等遂劫持昭宗到凤翔，投靠李茂贞。在朱温持续的军事压力下，李茂贞无奈，于天复三年（903）正月杀韩全诲等二十二人，同朱温议和。[29]至是内廷宦官头目又遭受一次重击。朱温挟持昭宗回归长安后不久，又杀第五可范等宦官七百余人，彻底清除了宫内庞大的宦官群体。在崔胤如愿的同时，外朝官僚也行将末路。

外朝官僚与内廷宦官群体的斗争，使得盘踞在地方上的军阀得以纷纷左右宫中事务，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军容头落，外朝士大夫也同宦官"玉石俱焚"。皇帝权威不在、人心思变的时代，地方军阀逐渐突破藩镇臣位的限制，开始觊觎天子之位。以昭宗为首的李唐宗室，不管政治能力如何，此时已经无力控制时局，只能任凭其发展。对于想要篡位的朱温来说，李唐宗王无疑是绊脚石。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朱温

还是颇为忌惮以德王为代表的李唐宗室。李唐末代诸王曾主掌兵权，可能仍然有一些政治影响。[30]他们的头饰也曾一度风靡都城：

昭宗时，十六宅诸王以华侈相尚，巾帻各自为制度，都人效之，则曰："为我作某王头。"[31]

昭宗天祐元年（904）八月，蒋玄晖弑逆，昭宗死于椒房之中。辉王李祚被更名为李柷，史称昭宣帝。天祐二年（905）二月戊戌社日，朱温指使蒋玄晖在洛阳屠杀昭宗诸子。《新唐书》在诠释这段历史时，依然将"十六宅诸王样"视作诸王之死的前兆。

在后世史家的滞后记述中，唐帝国瓦解前夜，依然是头饰率先预示了这种巨变。据《洛中纪异》记载：

昭宗播迁于凤翔，朱梁率诸道奉迎车驾时，侯王将帅在岐下者，皆以珠一颗盘幞头脚，贯以银线而簪之。军人咸以珠饰巾竞相夸尚。洎朱梁篡立，乃知珠已居人上者久矣。[32]

同时妇女流行的发髻、钗钏，也被后世史家解读为抛家、流离失所的前兆：

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近服妖也。抛家、流离，皆播迁之兆云。[33]

天祐三年（906）三月，历史又上演了禅让的剧目。正像后人对于"珠一颗盘幞头脚"的解读，唐代延续上百年的天子—诸侯的稳固结构，由朱温彻底结束。开平元年（907），朱温废唐哀帝，自行称帝，改名为朱晃，建都开封，国号为"大梁"。由此，唐朝结束了二百

八十九年的统治。

唐亡之后，历史再次进入分裂时代。有趣的是，这种军阀割据的时局依然外化于头饰上。《云麓漫钞》云：

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34]

确如赵彦卫所论，从后梁开始，各个君主权臣均依照时势而制定了自己独特的头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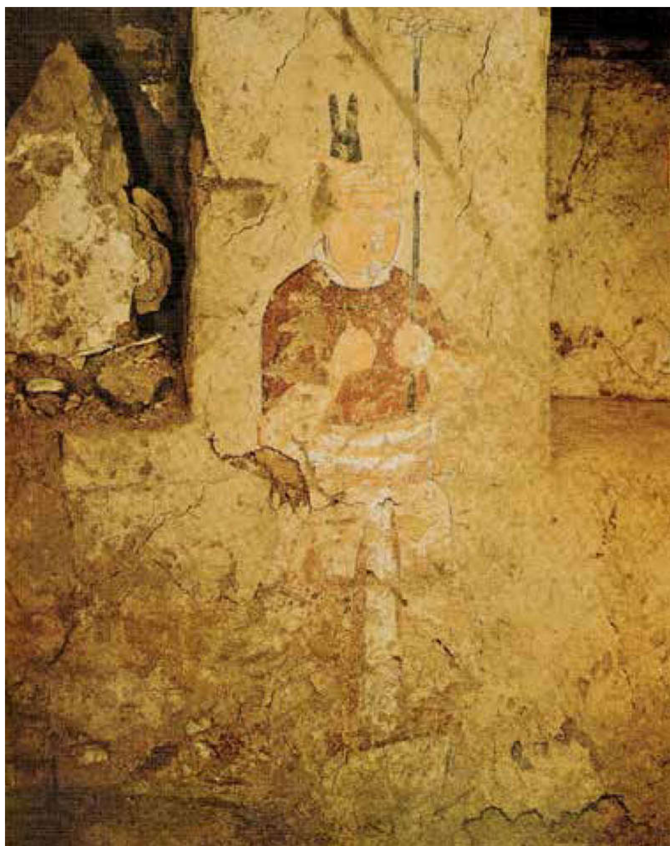


图67　执戟武士·唐[35]

（靖陵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唐僖宗靖陵曾出土壁画，仪卫戴朝天幞头，外扎红巾。



图68　《男侍图》·五代[36]

（王处直墓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壁画中的人物头戴硬脚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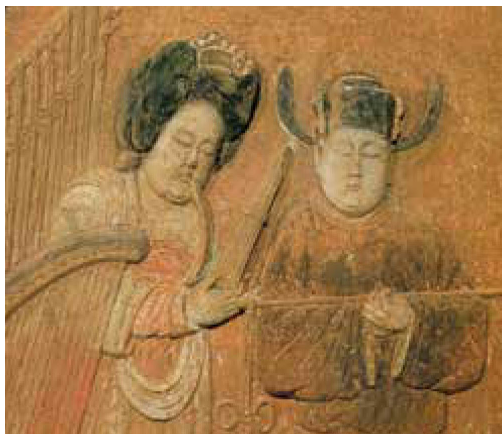


图69　散乐浮雕·持棒者与吹笙者·五代[37]

（王处直墓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右边人物所戴幞头二脚上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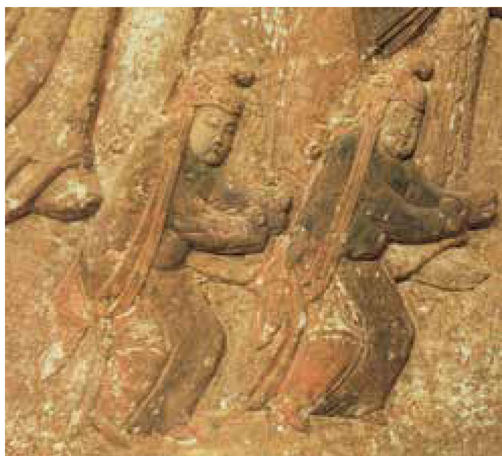


图70　散乐浮雕·队前导引者·五代[38]

（王处直墓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图中两个人物所戴幞头脚超长。



图71　东耳室东壁壁画（局部）·五代[39]

（王处直墓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图中有置于帽架上的幞头。



图72　《男侍图》·五代[40]

（王处直墓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壁画人物所戴幞头两脚反折于下。

乾化二年（912），朱温病重，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之事。朱温长子朱友富早逝。次假子博王朱友文，本姓康名勤，与朱温并没有血缘关系。第三子朱友珪，庶出，为营州娼妓所生。第四子，为均王朱友贞。从宗法继承制度来讲，只有朱友贞具备合法性。与朱温有血缘关系的朱友珪，也比朱友文承袭嗣位更合理。但朱温所属意的却是假子友文。从朱温对他委以大任来讲，史书记述是可信的。不过，朱温又没有立刻敲定嗣位，估计也是基于嫡出庶出的反复考虑。虽然乾化二年前后朱温中意于朱友文，但毕竟还没有将他正式立为太子。所

以，按常理来讲，朱温诸子都会觉得继位有望。朱友文的妻子王氏、朱友珪的妻子张氏均服侍于朱温身侧，史家常常将朱温淫于儿媳事件，看作是其晚年放荡淫乱、不修政事的行为。但事实上，朱温的儿子们愿意将自己的妻室置于朱温身侧，恰是因为此时储君未立，他们需要通过后宫势力来打探皇帝的想法。为了给朱友文的即位扫清障碍，朱温在此时逐渐开始诛杀、左迁宿将功臣，引起了朱友珪以及军功集团的不满。庶出的朱友珪正是利用了乾化二年立储前夜的种种矛盾，笼络了韩勍掌握的左龙虎军，发动政变，诛杀朱温。

朱友珪在乾化二年叛乱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贬斥敌对势力，笼络人心，树立权威。朱友珪曾对各个地方势力加以高官厚禄，厚赏宫内禁军。新头饰的推行，依旧被当作树立权威的手段。《清异录》记载：

郢王（朱友珪）凤历之叛，别制幞头，都如唐巾，但更双脚为仙藤耳，其徒号为顺裹。[41]

政变之后，朱友珪重新改造了幞头。这种幞头的基本形制与唐巾无异，但特色在于幞头双脚为“仙藤耳”。朱友珪的党徒，将这种头巾呼为“顺裹”。颇怀疑“顺裹”之义，即为顺从。

尽管朱友珪对地方军事势力曲加恩礼，希望得到他们的顺从，不过以他的庶出身份与政治资历，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还只是韩勍的左龙虎军，根本无以掌控全局。史言：“朝廷新有内难，中外人情恟恟。”[42]匡国节度使、天雄军节度使军内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叛乱。朱友珪不敢诘问，默认了地方军阀发生的异动。护国节度使朱友谦也并不稀罕朱友珪所赐予的高官厚禄，投靠了盘踞在河东的沙陀势力。次年，均王朱友贞与赵岩就联合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兵逼洛阳，朱友珪被迫自杀，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统治。在后梁政变不断、外戚掌权的状况下，李存勖正在声势浩大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梁唐争衡的天平，

也逐渐倾向李存勖一边。

公元923年李存勖攻灭后梁，完成父亲李克用遗业，统一北方，建立后唐。李存勖身陷伶人之困，常为后世史家叹惋。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43]

据史籍记载，李存勖即位之后曾推行过的为数众多的裹巾，与他“身预伶人”相关：

同光（李存勖）即位，犹袭故态，身预俳优，尚方进御巾裹，名品日新。[44]

至陶谷写成《清异录》时，唐庄宗李存勖所创造的巾子，还为伶人佩戴，存目二十种：

今伶人所顶尚有合其遗制者，曰圣逍遥、安乐巾、珠龙便巾、清凉宝山、交龙太守、六合舍人、二仪幞头、乌程样、玲珑高常侍、小朝天、玄虚令、漆相公、自在冠、凤翼、三千日华、轻利巾、九叶云、黑三郎、庆云仙圣、天宜卿，凡二十品。[45]



图73　《散乐图》（局部）·辽[46]

（宣化辽墓出土）

辽墓当中的乐舞人的头巾。幞头脚上插花，应是五代头饰之遗绪。上排中间人物，幞头脚反翘于上，插花。



图74　《散乐图》（局部）·辽[47]

（宣化辽墓出土）

图中乐手戴插花幞头。



图75　《出行图》（局部）·辽[48]

（宣化辽墓出土）
画中左一人物头戴可能是小朝天。画中左三人物所戴应该是无脚幞头。

依据史籍记载，巾裹“名品日新”的情况发生在“同光即位”之后，联想起来，可能也是李存勖在“仇雠已灭，天下已定”情况下，展示自己“意气之盛”的方式。这种独特的服饰应该与他当时特殊的心境有关。

后唐建立，原先臣附于后梁的楚、吴越、南汉、闽诸国，转而投唐，但前蜀和吴拒不称臣。此时蜀国正处于第二任皇帝王衍的统治之下。

王衍即位之后，也一改流行的危脑“小帽”，推行自己喜欢的“大帽”“尖巾”：

蜀王衍晚年，俗竞为小帽，仅覆其顶，俛首即堕，谓之“危脑帽”。衍以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间以大帽识之，因令国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状如锥。而后宫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号“醉妆”，国人皆效之。[49]

史书固以兴衰成败的基调来评述王衍，“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似乎是唐末五代史事的书写格套。薛居正先入为主的“僭伪”判断，欧阳修的“自然之理”，遮蔽了许多事实。相反，据《前蜀开国记》撰写而成的《蜀梼杌》，却没有引起现代史家的足够重视。[50]

细绎起来，王衍在即位前夜，事实上也并非王建属意的继承人。他是在宦官与后妃各种势力的扶持下才走上帝位的。[51]王衍自身究竟对政局有多大的控制力，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52]因此，王

衍在即位之后的屡次巡视、改制头饰的举动，是否也可以当作宣示权力的象征呢？

《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云：

蜀人富而喜遨，当王氏晚年，俗竞为小帽，仅覆其顶，俯首即堕，谓之“危脑帽”。衍以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间，民间以大帽识之，因令国中皆戴大帽。[53]

“蜀人富而喜遨”的起首句，明显带着价值判断。在《蜀梼杌》的记述中，改制头巾只是王衍移风易俗的一项措施，没有这样的价值判断：

六年（咸康）正月，禁民戴危帽。其制狭中，俯首即坠，在位者恶之。[54]

那么大帽、尖巾，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下推行的呢？

后梁灭亡必然会给前蜀带来巨大震动。梁灭之后，局势很清楚，唐与蜀的关系直逼台面。李存勖的政治目标明确，就是灭国。但是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前蜀乾德六年（924）八月的时候，王衍还向唐蜀边境增派了军队。[55]但在九月后唐李稠来访之后，前蜀好像完全判断错了李存勖的政治意图。

前蜀与后唐两次通使过后，前蜀以为两国修好，竟然不顾国门安危，连续撤回了边防军队：

蜀以唐修好，罢威武城戍，召关宏业等二十四军还成都。戊申，又罢武定、武兴招讨刘潜等三十七军。[56]

辛酉，蜀主罢天雄军招讨，命王承骞等二十九军还成都。[57]

蜀主罢金州屯戍，命王承勋等七军还成都。[58]

蜀国撤回秦州、凤州、洋州、金州等边防军的缘由，可能是后唐做过某种承诺。否则，蜀国这一系列的军事举动难以常理理解。但是，就仅凭某种承诺，后唐就能让王衍置国门不顾，放弃军事防备吗？如果蜀主“冲呆”，那么举国都如此吗？如果不单是因为唐蜀的某种政治默契，那么，是什么力量能够驱使王衍放弃边防、将军队撤回成都呢？



图76　王衍墓前翁仲·五代

（自摄）

联系当年宗室谋叛未遂的举动，似乎可以明白，掣肘王衍及其拥立集团的力量，始终是蜀境的王氏宗室：

蜀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俦以蜀主失德，与王宗弼谋废立，宗弼犹豫未决。庚戌，宗俦忧愤而卒。宗弼谓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

等曰："宗俦教我杀尔曹，今日无患矣。"光嗣辈俯伏泣谢。宗弼子承班闻之，谓人曰："吾家难乎免矣。"[59]

王衍撤防的举动似乎说明，王衍及其外戚拥立集团认为王氏宗室（当然包括王建假子）掌握边兵的威胁，超过了虎视眈眈的后唐。在撤回兵防之后，外戚"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节制京城诸军。"延琼以外戚代王宗弼居旧将之右，众皆不平"。公元918年出镇的王氏宗王[60]，于公元924年都被取消了军权[61]，隐约显示出外戚、内廷宦官对于政权的操控能力。

在完成这样一系列限制宗室的举动之后，王衍在正月接受朝贺，大赦改元为咸康（925）。同年三月，王衍在前往拜祭王建陵墓的时候，佩戴了尖巾。这可能是王衍和外戚在巩固内部权力之后，所进行的一次盛装巡行。尖巾应当是巡行过程中的刻意装饰，目的是宣示权威。同以往头饰流行的趋势一样，尖巾再致民众效仿。[62]同时，外戚嫔妃妾妓的妆容打扮，也风行于蜀国国境：

还宴怡神亭，嫔妃妾妓皆衣道服、莲花冠，髽髻为乐。夹脸连额，渥以朱粉，曰醉妆，国人皆效之。[63]

无论是乾德五年（923）塑造真形配享王子晋的举动[64]，还是咸康元年三月推行尖巾的措施，其实都是王衍对自己政治形象包装的一种方式，不能以"荒诞"一言蔽之。

但是在正史的叙述里，前蜀的灭亡，与王衍最后一次又看似骄奢淫逸的巡行相关。[65]王衍果真不关心唐蜀的边防之务吗？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王衍在最后的出行前，担忧些什么。

（咸康元年）四月朔，衍会群臣，举觞不饮，容色不悦。特进顾

在珦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临轩不乐，臣愿请罪。”衍曰：“北有后唐，南有蛮诏，朕既不能吊伐，彼又不为臣子，此所以忧尔。”在珦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忧。”[66]

即便王衍再“冲呆”，也不可能不对当时的局势有所判断。王衍的担心毕竟不是多余的，四月份后唐就再次遣使来聘，目的是“以觇虚实”。[67]

后唐李存勖的灭蜀计划早已敲定，只是或迟或早的事情，不会因为王衍是否骄奢淫逸，是否委政宦官、外戚而有所改变。这正如后世史家对于晚唐皇帝委任宦官的批评，换个角度来讲，委任与否有时候并非皇帝个体能左右。靠后宫、宦官势力拥立的皇帝，似乎不应该对他的权威有过高的期待。令人颇感蹊跷的是，前蜀几乎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抵抗，就亡于一次后唐突起的征伐。望风而退、临阵倒戈的正是王氏宗室，显示出王衍对于宗王根本没有控制力。[68]

后唐灭蜀后不久，同前蜀一样，李氏宗室由于外镇掌握军权，势力强盛。后唐的嗣子有时还延续着晚唐宦官、后宫势力拥立的格局。[69]后唐应顺元年（934），唐闵帝李从厚听信大臣的建议，准备调动各节度使之职，打算削弱宗王藩镇的实力。李从珂恐惧，遂反。他利用时机攻入京师洛阳，即帝位，改元清泰，并派人将逃亡的闵帝李从厚杀害。清泰年间曾流行过名为“李家宽”的幞头，这可能是李从珂在即位之后，为巩固权力而推行的新型头饰：

清泰燕服凡两品，幞头李家宽者，漆地加金线，棱盘四脚差细。[70]

后唐闵帝应顺元年，孟知祥在成都建都称帝，年号明德，国号蜀。孟蜀建立之后，应当也是有过改造幞头的举措。据《云麓漫钞》载：“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71]想来，“漆纱幞头”是孟蜀被宋灭亡前

流行的“景观”。

唐灭晋兴。后晋石敬瑭、石重贵是否推行过新的头饰，史无可考。但宰臣桑维翰的“蝉翼纱大人帽”，却曾“庶表四方”。[72]

桑维翰因协助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而为后世所熟知。在晋高祖时，他已为朝中权相，至少帝时权势更是臻于顶端。少帝石重贵“以维翰守中书令，再为枢密使、弘文馆大学士，继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数月之间，百度寖理。然权位既重，而四方赂遗，咸凑其门，故仍岁之间，积货巨万……”[73]蝉翼纱大人帽的流行，应当是桑维翰权势的体现。因此帽流行度广，化被国境，所以又被称作“化巾”。

在后晋时，还有一人的头饰别具风格。此人就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云麓漫钞》记载：

至刘汉高祖始仕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左右长丈余，横直之，不复上翘，迄今不改。[74]

“至刘汉高祖始仕晋为并州衙校”，是指刘知远在石敬瑭麾下发迹的历史。刘知远与石敬瑭俱出沙陀，二人同效力于后唐大将李嗣源（即后来的唐明宗）。刘知远在李嗣源部下为军卒，石敬瑭为李嗣源部将。在战事中，刘知远不顾自己的生死安危，两次救护石敬瑭脱难。石敬瑭感而爱之，以其护援有功，奏请将刘知远留在自己帐下，充当牙门都校。此种“横直展脚幞头”，也可能是刘知远权力成长的体现。横直幞头一直延续到刘知远建立后汉。至宋代，此种展脚幞头还是流行的头饰：

沈存中《笔谈》谓：唐惟人主得服硬脚，晚季方镇擅命始有僭服者。

《宣和重修卤簿图》言：唐制皆垂脚其后，帝服则脚上曲，五代汉后渐变平直。[75]



图77　《散乐图》·辽[76]

（宣化辽墓出土）
图中乐手戴双脚翘于上的幞头。

“五代汉后渐变平直”的趋势由现存图像材料也可以证明。处在西部边陲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就曾佩戴这种直角幞头。渐变平直其实是僭越的象征。



图78　曹元忠供养像·五代[77]

（榆林窟第19窟）

曹元忠所戴是五代时期流行的直脚幞头。



图79　曹议金供养像·五代[78]

（榆林窟第16窟）
曹议金头戴展脚幞头，着圆领大袖红袍衫。

其实不仅是在中原、西南争衡的几个政权热衷于头饰改造，身处南方的南汉、马楚、南唐在树立地方权威的过程中，也都有过改造头饰的举措。

首先来看南汉。刘隐死后，其弟刘陟（刘□）袭封南海王。刘陟凭借父兄在岭南的基业，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在番禺（今广州）称帝，称兴王府，国号“大越”。次年（918），刘陟以汉朝刘氏后裔的身份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偏重一隅的刘氏政权由一方节度使到称帝自立，心态也有不少改变：

惟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而示之，夸其壮丽。每对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为蛮夷之主。又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类也。[79]

由是，改变头饰成为刘陟宣扬大汉新建的手段之一。《清异录》云：

南汉僭创小国，乃作平顶帽自冠之，由是风俗一变，皆以安丰顶为尚。[80]

盘踞在湖南的马楚政权统治者始终没有称帝。按照马殷的遗命，楚王继位的顺序应是兄终弟及，“希声卒，而希范以次立，袭殷官爵，封楚王”。尽管此时后唐政权积弱，但马希范依然接受了后唐的册封：“清泰二年，赐以弓矢冠剑。天福四年，加希范天册上将军，开府承制如殷故事。”[81]

不过，正如刘陟所说“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82]，五代是人心思变的时代。在其他政权统治者纷纷称帝的情况下，马氏政权从来没有心动过？马希范佩戴的头饰，似乎也曾透露出一些欲将“僭越”的信息。他的幞头脚不仅平直，而且极长：

湖南马希范二角左右长丈余，谓之龙角，人或误触之，则终日头痛。[83]

马希范称长脚幞头为“龙角”，自有来历。他曾经创制一宫殿，名作“九龙殿”，实际上宫殿是“以八龙绕柱”，另外一龙他认为是自己，所谓“自言身一龙也”。[84]马希范将长脚幞头称为“龙角”，应当也是在标识他的“真龙”身份。既曰“龙身”“龙角”，是否也可说明马希范曾有

过不臣之心？如所周知，龙在五代时期，已然成为帝王之征。比如前后蜀、南汉政权均曾利用过和龙有关的符瑞标明天命。[85]再联系当时时代背景，契丹灭晋后，马楚政权内部确实出现了“以驱京师，倡义于天下”的思潮：

希范又作九龙殿，以八龙绕柱，自言身一龙也。是时，契丹灭晋，中国大乱，希范牙将丁思觐廷谏希范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战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邻敌，传国三世，有地数千里，养兵十万人。天子囚辱，中国无主，真霸者立功之时。诚能悉国之兵出荆、襄，以趋京师，倡义于天下，此桓、文之业也。奈何耗国用而穷土木，为儿女之乐乎？”希范谢之，思觐嗔目视希范曰：“孺子终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86]



图80-1　宋太祖像·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0-2　宋哲宗像·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太祖、哲宗像，幞头脚展直。可以想见马希范的幞头更长更直。

在史料的叙述中，马希范虽然谢绝了提议，以至于牙将丁思觐扼喉而死，但这不代表他没有过成为天下之主的想法。马希范自比于龙，很有可能与当时中原无主、牙兵鼓噪进军的局势相关。而龙角幞头应当恰是马希范某种政治企图的外化。



图81　《三老对弈图》·辽[87]

（宣化辽墓出土）
图中老者戴长脚幞头。



图82　《门吏图》·北汉[88]

（北汉太惠妃墓出土）
壁画人物所戴幞头呈现出平直状。

后唐同光四年（926）邺都发生兵变，在这次变乱中韩氏家族受到牵连，韩熙载播迁江南。起先，韩熙载并不受重用。南唐保大元年（943），先主李昪驾崩，太子李璟即位，韩熙载迎来仕途上的转机，尽管仕途多难，但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户部侍郎。至后主李煜即位前夜，他已经升迁为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韩熙载身在江南时文名远播，因为文采飞扬，颇有社会影响。他所佩戴的轻纱帽也别具特色，被命名为“韩君轻格”。[89]韩君轻格创制于何时尚难考订。不过，至迟在后主李煜时，韩熙载已经在佩戴这种头饰。《韩熙载夜宴图》中，韩熙载所佩戴的纱帽与画中人物所佩戴的垂脚幞头，呈现

出鲜明的对比。《韩熙载夜宴图》创制的背景正是后主李煜想要依赖韩熙载，又忌惮韩熙载的权势成长，所以派顾闳中模画韩熙载宴会的场景，以图监视。



图83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南唐·顾闳中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主人公韩熙载所戴即为轻纱帽。



纱帽是韩熙载身份的特殊标识，以至于到宋代时，后世人所画的韩愈也出现了时空错乱、衣冠异制的现象。沈括曾一语断定，戴纱帽的韩愈像应当是南唐韩熙载的形象：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美髯，着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辩，退之遂为熙载矣。[90]

黄巢之乱，罗隐南迁吴越国，他佩戴的头饰，也曾引领过时尚潮流。《清异录》记载：

罗隐帽轻巧简便省朴，人窃仿学，相传为减样方平帽。[91]

“减样方平帽”的流行，似乎与权力的更迭无关，纯为方便之故。

后周广顺时，曾在太庙中出现过“珠络平金朝天幞头”[92]，但由于仅有孤证，无可发覆。

宋代沿袭了五代幞头种类繁多的式样，这点在诸家宋人的笔记中多有记述。《梦溪笔谈》有云：

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93]



图84　《门吏图》（局部）·辽[94]

（宣化辽墓出土）
壁画中人物戴交脚幞头。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生于天圣九年（1031），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仕宦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哲宗元祐三年（1088），移居润州，撰写《梦溪笔谈》。[95]是书所记应是此一时期的头饰流行状况。

《朱子语类》卷九一《杂仪》也曾叙及太宗到仁宗时期，幞头材质的变化：

后人觉得不安，到本朝太宗时，又以藤作骨子，以纱糊于上。后又觉见不安，到仁宗时，方以漆纱为之。[96]

朱熹自云阅过《麈史》，因此有关幞头演变的知识，当来自是书：

然折上巾，以余帛折而上系，今谓之幞头小脚，其所垂两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后又为两阔脚短而锐者，名牛耳幞头。唐谓之软裹，至中末以后浸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则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而已。其巾子先以结藤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数层为之里。亦有草巾子者，以其价廉，士人鲜服。后取其轻便，遂彻其楮，作粘纱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废止，以漆纱为之，谓之“纱巾”，而粘纱亦不复作矣。其巾之样始作前屈，谓之“敛巾”，久之，作微敛而已。后为稍直者，又变而后抑，谓之“偃巾”，已而又为直巾者，又为上下差狭而中大者，谓之“梭巾”。今乃制为平直巾矣。其两脚始则全狭后而长，稍变又阔而短，今长短阔狭仅得中矣。[97]

叶梦得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他在《石林燕语》中，也记录了有关绍圣后幞头形制由折上到后偃的变化：

旧制，幞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98]

北宋政府曾多次申禁民间穿戴钓墩、毡笠之类的契丹服饰，而南渡后面对金人巨大的军事压力，南宋朝廷为凝聚民心，同仇敌忾，对胡俗的管控更为严格。绍兴二十一年（1151），高宗下令禁止市井娱乐中的胡服、胡乐：

都市为戏，加篦巾、批卧辣、执藤鞭，群吹鹧鸪笛，拨葫芦琴，效胡乐、胡舞，长跪献酒。时狄患仅定，上念境土未复，将用夏变

夷，命有司禁止之。[99]

总之，迄至天水一朝，头饰仍然随时而变。无论是前倾还是后偃，似乎也都有象征意义。囿于讨论时限与学力，这里笔者只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诸家记述勾勒出幞头变化的具体趋势，至于变化的政治社会驱动力，则留待将来进一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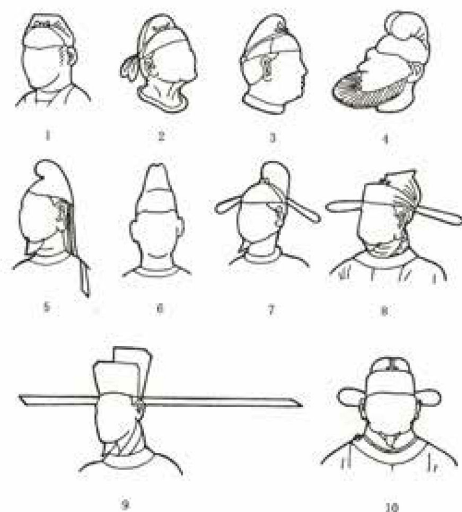



图85　幞状的演变[100]

1. 平头幞头（独孤开远墓［唐贞观十六年］出土俑）2. 硬脚幞头（李贤墓［唐开元二年］石椁线雕）3. 前踣式幞头（戴令言墓［唐开元二年］出土俑）4. 圆头幞头（豆卢建墓［唐天宝三年］出土俑）5. 长脚幞头（莫高窟130窟盛唐壁画上的供养人）6. 衬尖巾子的幞头（曹景林墓［唐建中三年］出土俑）7. 直脚幞头（敦煌石室所出唐咸通五年绢本佛画上的供养人）8. 翘脚幞头（莫高窟144窟五代壁画上的供养人）9. 宋式展脚幞头（宋哲宗像） 10. 明式乌纱帽（于谦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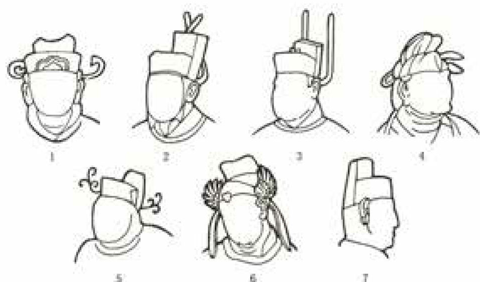


图86　几种形制特殊的幞头[101]

1. 局脚幞头（白沙宋墓壁画）2. 交脚幞头（宣化辽墓壁画）3. 朝天幞头（高平开化寺宋代壁画）4. 顺风幞头（西安唐韦洞墓壁画）5. 卷脚幞头（焦作金邹墓画像石）6. 凤翅幞头（焦作老万庄元墓壁画）7. 无脚幞头（巩义宋永熙陵石雕）

---

(1)本章标题中的“五代僭越样”并不是古代文献中出现的名词，是作者为了统一体例，根据五代头饰特点新创的名词。

[2]《唐语林校证》卷四，第347页；《大唐传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889—890页；《册府元龟》卷七九二《总录部·慕贤》，第9401页；〔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四九三《人事部·奢》，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257页；《唐会要》卷三一，第675页。

[3]《封氏闻见记校注》，第46页。

[4]《封氏闻见记校注》，第46页。

[5]《封氏闻见记校注》，第46页。

[6]《大唐壁画》，第78页。

[7]《封氏闻见记校注》，第46页。

[8]《旧唐书》卷一一七，第3395页。

[9]《唐会要》卷三二，第681页。

[10]《唐会要》卷一六《庙议》，第388页。

[11]《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宪宗元和元年”条，第7627页。

[12]参考刘玉峰《唐德宗评传》第一章“唐德宗朝的中央与藩镇”第三节“兵变后的削藩战场和藩镇政策”，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48—61页。

[13]《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第4414—4415页。

[14]《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5页。

[15]〔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席帽》，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6页。

[16]关于唐代宦官问题，唐长孺、牛志平、何灿浩、矢野主税、陆扬等中外学者都有精辟的论述，详可参胡戟等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近年黄楼博士论文《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亦对宦官政治做了详细的分析讨论。

[1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一《杂仪》，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27—2328页。

[18]《资治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三年正月甲子”条，第8596页。

[19]《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肃宗乾元元年”，第7061页。

[20]参《旧唐书》卷一八四《鱼朝恩传》，第4763页；《新唐书》卷二〇七《鱼朝恩传》，第5863页。

[21]《古代西域服饰撷萃》，第93页。

[22]〔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五《令狐公密状木团头附》，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5页。

[23]参见黄楼《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第149页。

[24]〔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二《幞头垂脚不垂脚》，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8页。此记载应出自秦再思《洛中纪异》：“至昭宗乾符初，教坊内教头张口笑者，以银捻幞头脚上簪花钗，与内人裹之。上悦，乃曰：‘与朕依此样进一枚来。’上亲栉之，复揽镜大悦。由是京师贵近效之。”

[2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散乐图》6。

[26]《云麓漫钞》卷三，第39页。

[27]《旧唐书》卷一八四《田令孜传》，第4771—4772页。

[28]《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第879页。

[29]《资治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二年”条：“凤翔兵十余人遮韩全诲于左银台门，喧骂曰：‘阖境涂炭，阖城馁死，正为军容辈数人耳！’全诲叩头诉于茂贞，茂贞曰：‘卒辈何知？’命酌酒两杯，对饮而罢。又诉于上，上亦谕解之。李继昭谓全诲曰：‘昔杨军容破杨守亮一族，今军容亦破继昭一族邪！’慢骂之，遂出降于全忠，复姓符，名道昭……戊申，李茂贞独见上，中尉韩全诲、张彦弘、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皆不得对。茂贞请诛全诲等，与朱全忠和解，奉车驾还京。上喜，即遣内养帅凤翔卒四十人收全诲等，斩之。”（第8588—8591页）

[30]参见《旧唐书》卷一七五《昭宗十子》，第4545—4548页。

[31]《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服妖》，第880页。

[32]〔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六《洛中纪异》，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3]《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服妖》，第879页。

[34]《云麓漫钞》卷三，第39页。

[35]《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第395页。

[3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编著：《五代王处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彩版19。

[37]《五代王处直墓》，彩版47。

[38]《五代王处直墓》，彩版49。

[39]《五代王处直墓》，彩版19。

[40]《五代王处直墓》，彩版4。

[41]〔宋〕陶谷：《清异录》卷下《衣服》，《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42]《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太祖乾化二年”条，第8759页。

[4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7页。

[44]《清异录》卷下《衣服》，第86页。

[45]《清异录》卷下《衣服》，第86页。

[46]《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6。

[47]《宣化辽墓壁画》，图版43。

[48]《宣化辽墓壁画》，图版55。

[49]〔元〕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三一〇《物异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401页。

[50]张唐英叙述其撰作缘起及撰作所本，态度是严肃的。他指出时下有关王孟据蜀时的一些记载存在的问题，因故撰写了《蜀梼杌》。固然他希望撰作的目的是“以为记恶之戒，非徒衍其小说，亦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惧”，但由于不需要政治正确，相校于薛、欧《五代史》而言，史料价值值得重视。“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孙述辈，最为久远，其间善恶之迹，亦可为世之鉴戒。然编录者，如《耆旧传》《鉴戒录》《野人闲话》之类，皆本末颠倒，鄙俗无取。真宗时，知制诰路公振修《九国书》，有前蜀、后蜀世家、列传，然而烦简失当，尚多疏略。如张扶、冯涓、张士乔、段融、蒲禹卿、张云、陈及、田淳之徒谏诤章疏，皆有益于世教，尽弃而不录，此观者所以惜其有未备也！予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凡三十六卷，尝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检阅始终，削去烦冗，编年叙事，分为二卷。其间事实未显，如髯须、肥遗、远望、绩长、禹粮、蒲骚之类，各为解其失误。凡《五代史》及《皇朝日历》所载者，皆略而不书。名曰《蜀梼杌》，盖取楚史之名，以为记恶之戒，非徒衍其小说，亦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惧云耳。”参见〔宋〕张唐英撰，王文才、王衍校笺《蜀梼杌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1—2页。

[51]《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第三》：“衍为人方颐大口，垂手过

膝，顾目见耳，颇知学问，能为浮艳之辞。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辂貌类己，而信王宗杰于诸子最材贤，欲于两人择立之。而徐妃专宠，建老昏耄，妃与宦者唐文扆教相者上言衍相最贵，又讽宰相张格赞成之，衍由是得为太子。”（第791页）

[52]《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均王贞明四年”条：“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第8826页）《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建卒，衍立，谥建曰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号昭圣皇后，后建数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为皇太后，后妹淑妃为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阙，必数人并争，而入钱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第791页）

[53]《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第792页。

[54]《蜀梼杌校笺》，第189页。

[55]《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条：“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远军使王宗锷为招讨马步使，帅二十一军屯洋州；乙亥，以长直马军使林思锷为昭武节度使，戍利州以备唐。”（第8924页）

[56]《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条，第8927页。

[57]《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条，第8927页。

[58]《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条，第8928页。

[59]《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条，第8925页。

[60]《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均王贞明四年”条，第8833—8834页。

[61]《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条，第8929页。

[62]《蜀梼杌校笺》，第197页。

[63]《蜀梼杌校笺》，第197页。

[64]《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第三》：“五年，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第793页）

[65]《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第三》：“以王承休妻严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谏，衍不听。行至梓潼，大风发屋拔木，太史曰：‘此贪狼风也，当有败军杀将者。’衍不省。”（第792页）

[66]《蜀梼杌校笺》，第199页。

[67]《旧五代史》卷七〇《李严传》言此次出使是在“同光中”，《新五代史》卷二六《李严传》言是“同光三年”（925），按同光三年与《蜀梼杌》记载相同。

[68]《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第三》：“衍至绵谷而唐师入其境，衍惧，遽还。唐师所至，州县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绵谷，遣王宗勋、宗俨、宗昱率兵以拒唐师。宗勋等至三泉，望风退走。衍诏宗弼诛宗勋等，宗弼反与宗勋等合谋，送款于唐师。衍自绵谷还成都，百官及后宫迎谒七里亭，衍杂宫人作回鹘队以入。明日，御文明殿，与其群臣相对涕泣。而宗弼亦自绵谷驰归，登太玄门，收成都尹韩昭、宦者宋光嗣、景润澄、欧阳晃等杀之，函首送于继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迁衍于天启宫。魏王继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缚舆榇，出降于七里亭。”（第793页）

[69]《新五代史》卷七《唐本纪》：“四年十一月，秦王从荣伏诛。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汉琼召王于邺，而明宗崩，秘其丧六日。十二月癸卯朔，发丧于西宫，皇帝即位于柩前……”（第69页）

[70]《清异录》卷下《衣服》，第86页。

[71]《云麓漫钞》卷三，第40页。

[72]《清异录》卷下《衣服》，第86页。

[73]〔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167页。

[74]《云麓漫钞》卷三，第40页。

[75]《演繁露》卷一二《幞头垂脚不垂脚》，第138页。

[76]《宣化辽墓壁画》，图版89。

[77]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4年，图版63。

[78]《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58。

[79]《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二》，第1808—1809页。

[80]《清异录》卷下《衣服》，第86页。

[81]《新五代史》卷六六《楚世家第六》，第826页。

[82]《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均王贞明元年”条，第8799页。

[83]《云麓漫钞》卷三，第40页。

[84]《新五代史》卷六六《楚世家第六》，第826页。

[85]《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第五》：“九年，白龙见南宫三清殿，改元曰白龙，又更名□，以应龙见之祥。有胡僧言：‘〈谶书〉：灭刘氏者，□也。’□乃采周易‘飞龙在天’之义为‘□’字，音‘俨’，以名焉。”（第812页）《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第三》：“三年八月，有龙五十见洵阳水中。”（第788页）

[86]《新五代史》卷六六《楚世家第六》，第826—827页。

[87]《宣化辽墓壁画》，第29页。

[88]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青阳河北汉太惠妃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6期。

[89]《清异录》卷下《衣服》，第86页。

[90]《梦溪笔谈校证》，第191页。

[91]《清异录》卷下《服饰》，第86页。

[92]《清异录》卷下《服饰》，第85页。

[93]《梦溪笔谈校证》，第57—58页。

[94]《宣化辽墓壁画》，图版53。

[95]参见徐规《沈括事迹编年》，氏著《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

[96]《朱子语类》卷九一《杂仪》，第2329页。

[97]〔宋〕王得臣撰，俞宗宪校点：《麈史》卷上《礼仪》，收入《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322页。

[98]〔宋〕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99]宋代的胡服之禁，参见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00]《中国古舆服论丛》，第212页。

[101]《中国古舆服论丛》，第214页。

# 结语

# 微观史——唐代政治史的“头饰”观察

中古时期权力展现、运行的场或媒介是君臣关系。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权力与服饰的关系，首先表现的是社会、政治关系的界定，即“臣僚对君主”的服从。服从关系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臣僚穿着君主推行的“冠带”。因而，开国皇帝一个重要的立国策略，便是根据所属天命、德运更改服饰色彩图案，然后强制推行。[1]服饰的赏赐是构建君臣关系的一种重要仪式。与此同时，被推行的服饰也像移动“景观”一样，时刻彰显帝制时代的国家权威或个人荣显。[2]有学者在研究大和六年（832）王涯有关舆服制度的奏议时，曾指出唐代规定冠服制度的基本是《衣服令》，而规定常服制度的主要是《礼部式》。[3]无论是令还是式，目的都是通过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进行权力等级划分。不过，权力构建有时也是非正式的，并非都通过国家法规、制度的形式来实现。在私人的“场”，君主对臣僚的服饰赏赐、臣僚对君主服饰的模仿，也在某种程度上构建着君臣权力关系。

服饰不断更替，固然与某一时期时代风气造就的文化品位相关。但服饰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符号”，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表达的凭依、微观权力运作的舞台。[4]布尔迪厄曾解释道：“不同阶级（利

用服装）自我表现的兴趣，其所投注的注意力，其对所得利益的意识，及其实际花费的时间、精力、代价和照料等，都与他们合理期望的自己从中获得物质利益与象征利益的机会成正比。”[5]阎步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说：“什么人愿意为等级服饰投入更大的精力，那群人一定由此获得了更大利益，反之亦然。”[6]从这样的角度透视，服饰不仅仅具备保暖御寒的物理功能，也不仅仅是文化品位的标识。认识服饰更深刻的意义，大概是要通过这些看似属于文化表象、符号的服饰，认识到其背后的权力配置或是意图表达。那么，什么样的人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服装达到自我表现、引领服饰文化品位的目的呢？当然是那些为了攫取更多资源配置，处于政治权力顶端的人物。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朝廷各方政治力量的兴衰浮沉会在服饰的变迁上留下痕迹、得到反映；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种政治势力的更替，通常都会通过颠覆原来服饰以建立新的视觉“景观”。《礼记·王制》曰：“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7]早期的儒家经典，已将服制变革看作叛乱的象征。在古人看来，服饰改革确实是颠覆秩序的政治事件。也许与政治集团的变动相比，服饰的变动似乎显得不那么“深刻”。不过，服饰恰是最直接的“革命”举动，也是政治变革、宣扬教化的直观表现。就这一层面而言，本文观察的并不是物本身，而是背后使物带有某种“性格”的人。

研究者在考察政治史时，以人为核心，讨论集团所属、权力升降，这当然很重要。不过，在关注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到，政治及其权力可以外化成多种形式，服饰即是一种表达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如本文研究所示，至迟从北周以来，政治精英们就不断在幞头的基本形制上进行创新。政治形象包装的范式一旦树立，便会成为传统。这种政治精英热衷于改造、佩戴新式幞头的现象，在唐五代也具有长时段的延续性。幞头改样与政治嬗变有一条若隐若现并相契合、联系的脉络。北朝末年迄至隋唐五代，著名政治人物的头饰引领着服装时尚，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头饰的改制往往成为时局异动的动态表征。时局变，头饰亦变。因而通过头饰的变动来

观察政治演进，也可以使以往唐代政治演进过程中一些晦涩难明的政治事件，得以从更细致的角度来观察。

幞头本起源于胡人头饰，有着“索发”的遗迹，进入中原后呈风靡发展之势。幞头的最初流行，显现出中古历史的“胡化”之风。此后，幞头形制屡有演变。而推动幞头变化的最直接驱动力，则是掌握核心权力的政治人物。推行新头饰，不仅仅是塑造一种新的视觉感受，亦是政治人物在重要政治变革期，宣示巩固地位的手段。如果将头饰变革当作政治人物宣示权力的手段还原到政治史的脉络当中去，进而考察前后的历史事件，似乎会发现，一些因史学家史观而被层层包裹的人物、事件，会脱离脸谱化，变得鲜活起来。

从唐代前期的“平头小样”到“武家诸王样”的变化，便伴随着唐代政治的一次重大变革。武家诸王样是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利用舆服制度推出武家诸王，宣扬并巩固自己权力的手段。武家诸王样的核心意义，体现在“武家诸王”四字上。武家诸王样是武则天推出武家诸王，重建权力结构的外在物质符号。武家诸王样的颁赐，也在某一层面暗示着武家诸王行将在武周一朝扮演的角色。诸王的分封，权力的形塑，无非想要以武氏本家为第一家族，凌驾于整个朝堂之上。[8]

此后随着政治势力的演变，帽样、舆服等也最能彰显政治人物的权势与企图。中宗上台，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势，旧有的武家势力与新兴的后族势力时刻在左右着朝局。他们的权势也或多或少反映在服饰上。经过景龙二年（708）的李重俊兵变，武家诸王的势力大为衰颓。中宗与韦后的关系最直接地突显出来。“英王踣样”的推行，时值景龙四年（710），此时正是外戚韦后、安乐公主欲将革命之时。从一系列接续的政治事件来看，英王踣样颁行也应当是中宗宣示权力的举动之一。不过，就在颁行新帽样两个月后，中宗被韦后、安乐公主鸩杀。

随着唐隆政变，太平公主、李隆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据史料记

载，太平公主早年就尚男装，她也有一种名为“玉叶冠”的头饰著称于世。太平公主的势力被李隆基剿灭之后，历史正式进入玄宗时代。开元初年，玄宗虽然没有推行新的帽样，但他连续颁敕申禁，改革武、韦以来的奢靡世风。新的政治秩序也在这种移风易俗中重建。开元中后期，玄宗推行“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也与他欲抑制宰相张说权势、彰显皇权的想法一致。玄宗改造张说的服饰，其实只是开元期间君主专制、进而限制宰相权力的一个缩影。

安史之乱后，帽样依然随时而变。肃宗时又出现了“仆射样”。中晚唐宦官的权势也体现在头饰上，出现了所谓的“军容头”。唐末乾符年间，宫女制作成一种不用“如平时对镜系裹”的新头饰，这可能与政局动荡、长安屡陷的时局相关。皇帝、宫女需要随时逃跑，无暇打扮。唐亡之后，历史再次进入割据时代，各个地方政权的皇帝更是热衷于头饰的改造，这同样是他们依据所处的地域时势伸张权力的独特方式。

头饰如时局，也会因为不同的政治形势，具备不同的时代格。头饰是权力的一种渗透凭依。因而，在后世史家的阐说中，《五行志·服妖》一门屡将头饰看作政治变革、权力陵夷的预兆。由北朝经唐到宋，政治演进过程中的胡风汉韵、治乱兴衰，不同阶层崛起的历史趋势，似乎都由头饰可以窥得一点时代斑斓。“为物的生命立传，把物看作与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是阿尔君·阿帕杜莱的主张。[9]以上对于中古幞头流变的政治解读，算是对这种“立传”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吧。这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物品，很可能都曾是视觉政治的内容。

北周至五代头饰变化表

| | |
|---|---|
| 周文帝 | 突骑帽 |
| 周武帝 | 折上巾 |
| 隋文帝 | 乌纱帽 |
| 太子李建成 | 花搭耳帽子 |
| 唐太宗 | 翼善冠、进德冠 |
| 长孙无忌 | 赵公浑脱帽 |
| 魏王李泰 | 魏王踣样 |
| 武家诸王 | 武家诸王样 |
| 唐中宗 | 英王踣样 |
| 太平公主 | 女扮男装、玉叶冠 |
| 唐玄宗 | 长脚罗幞头、官样圆头巾子 |
| 杨贵妃 | 假髻 |
| 裴冕 | 仆射样 |
| 鱼朝恩 | 山子军容头 |
| 裴度 | 毡帽 |
| 宦官 | 军容头 |
| 唐僖宗 | 银捻幞头脚上簪花钗、木团头 |
| 唐昭宗 | 盘珠幞头 |
| 军士 | 洛阳大帽 |
| 十六宅诸王 | 十六宅诸王样 |

续表

| | |
|---|---|
| 后梁朱友珪 | 仙藤耳顺裹 |
| 后唐李存勖 | 圣逍遥、安乐巾、珠龙便巾、清凉宝山、交龙太守、六合舍人、二仪幞头、乌程样、玲珑高常侍、小朝天、玄虚令、漆相公、自在冠、凤翼、三千日华、轻利巾、九叶云、黑三郎、庆云仙圣、天宜卿 |
| 前蜀王衍 | 大帽、尖巾 |
| 后唐清泰年间 | 李家宽 |
| 后晋桑维翰 | 化巾 |
| 后汉刘知远 | 横直展脚幞头 |
| 后蜀 | 漆纱幞头 |
| 马楚马希范 | 龙角幞头 |
| 南唐韩熙载 | 韩君轻格 |

---

[1]参见《通典》卷五五《历代所尚》，第1543—1547页。

[2]比如，佩戴鱼袋的目的，一是区别等级，二是彰显荣重。《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载永徽五年（654）八月十四日敕云："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彰要重。"（第676页）

[3]参见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卷一〇，第299页。

[4]参见刘永华《物：多重面向、日常性与生命史》，《文汇学人》2016年5月20日。新近利用这种理论的实证研究，可参见汤晓燕《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

[5]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 202.译文转引自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4页。

[6]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5页。

[7]〔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一二《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页。

[8]参见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文集》（全八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4页。唐先生指出，西晋至南北朝的宗王出镇，与该历史时期的政权结构有关，即皇室欲以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相比于西晋、南北朝而言，唐代前期乃至武周政权的封建，虽只是亲王遥领，并不出镇，但皇帝仍欲建立以皇室为第一家族而凌驾于朝局之上的政权。

[9]Arjun Appadura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概要观点可参见舒瑜《物的生命传记——〈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 后记

在同龄朋友们纷纷声称要告别政治史的时候，我却要出版一本叫《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的小书，显得有些反潮流。这一年来还因为写政治史，好几次感觉自己好像有了“原罪”。其实仔细想想，我不是故意唱反调、逆潮流。没赶上形势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自己实在手太慢，跟不上时下各种或新潮或复古的倡导。不过，我也落后得心安理得。好多朋友都说起这样一种情形，现在中古史学界有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口号，用来指导初学者研究，究竟从谁呢？其实仔细想想还是从心所欲就好。熟悉的友人们调侃说，这本小书是“花样政治史”。他们的调侃我很理解。这本小册子虽然叫政治史，却不大像以往标准“模样”的政治史。不过，稍微能让人觉得有些“不一样”，我也算知足了。如何不同于以往有关器物类型学的研究，写一点“异样”的物质文化史或者政治史，也算是我的初衷吧。

其实，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工作者，交出来的第一本书不应该是这样一本小册子。但既然写了而且要出版，完成后记时总要找一个不一定能说服读者但要能说服自己的理由。

我自己在进入中古史学习的时候，一度看得最多的就是政治史。从本科学习历史起，《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东晋门阀政治》《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就是反复阅读最多的书。2009年9月从西安负笈千里，来武汉读研究生，接受学术训练。那时陆续听过几次名家的报告，他们都有一种关于中古政治史没

有什么可以研究的焦虑。大概十年前，研究政治史流行的方法是“集团分析法”。我也曾积极学习这样的方法，用来分析史料，写了不少政治史的札记。不过，后来随着阅读量增加，渐渐觉得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可能未必这么单一。在西方政治学学说里，权力是一种重要的概念。一般来说，权力最主要的考察范畴涉及实力角逐、统治与被统治、精英与大众、斗争与反抗，等等。不过，在中西方学术界，有关权力的定义着实纷繁复杂。从不同角度看，权力的内涵和外延有着不同的界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旗帜鲜明地主张“权力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倡言“权力微观物理学”[1]。在此基础上，他对于权力的运作进行了一系列独特的考察。福柯认为权力如血液一样，沿着血管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包。话语、建筑、服装、容貌、仪式、学校、监狱、医院等，都可能成为权力表达、表演或者规制、惩戒的工具。福柯学说最大的意义，在于扩大了权力的考察范畴。他不但探讨国家层面的权力运作，还进行了权力的微观考察。福柯曾这样说，权力“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肌理，触及他们的肉体，并融入他们的行为举止、话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沿着福柯的思路，西方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研究权力，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福柯主张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应当也适合中国古史的考察。因为政治生活与权力运作是广泛的人类现象，无须区分东方与西方。研究者在观察中国政治史过程时，以人为核心，讨论集团所属、权力升降，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在关注这些问题的同时，不要忘了政治、权力可以外化成多种形式。如果考虑到政治的核心要素是权力，那么考察权力其实有多种方式。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也一直在努力试图扩大政治史的考察范畴，关注过宾礼中的二王三恪、政治宗教景观——明堂、唐代军礼中的凯旋仪式，等等。后来阅读《舆服志》、礼制文献，觉得服饰也是一种表达权力和政治理念的重要手段，遂想要从服饰的角度解读政治。

书的内容有点“花样”，但最基本的提问方式还是从阅读史料而来。这里还是认真谈一下怎么形成的这本小册子为好。真正关注头饰

问题，是在2011年。那时候上冻国栋老师给博士生开的课，在冻老师的指导下系统阅读唐代典制史籍。因为硕博连读，免去写硕士论文和考试，所以有时间从容研读一些部头稍大的唐代典制史籍，诸如《通典》《唐会要》之类。

《唐会要》卷三一《巾子》：

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头小样者。

天授二年，则天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景龙四年三月内宴，赐宰臣已下内样巾子。其样高而踣，皇帝在藩时所冠，故时人号为“英王踣样”。

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

永泰元年，裴冕为左仆射，自创巾，号曰“仆射样”。

太和三年正月，宣令诸司小儿，勿许裹大巾子入内。

这些材料也见于《通典·嘉礼》。读完这些材料，当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利用，但脑海里却呈现出一系列问题。即是，什么力量驱动幞头发生变化的，他们为什么要戴这种款式的幞头，这样穿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甚至还想象过他们戴着这些头饰是怎样出现在长安大街坊巷的。于是去阅读相关成果，搜集壁画图像里保留下来的各种材料。目的还是最朴素的，即让史料互证多说话，多找一些视觉场景的感觉。

后来根据搜集的材料，渐次写了几篇札记，进而缀合成一篇长文。在冻国栋老师的课上汇报过想法，在刘安志老师的课上宣读过成文，得到二位老师的一些提示、指正。写完后也呈请魏斌老师批评，获得了很好的建议。

2014年6月博士毕业，有幸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制度与权力——

第八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会议”，会上宣读了此文。陈勇、叶炜、孙正军、陈侃理、仇鹿鸣等老师都给了我很多宝贵意见。在吸收意见后，鼓起勇气向《历史研究》投稿。文稿审查加上我的后续修改，延宕两年后才刊登出来。这里特别要感谢的是路育松老师。她的悉心审校，让我避免不少错误。同时也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一些反馈。其中，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考古方向的刘未老师，表示曾推荐给考古系的学生读。武汉大学研究世界史的陈勇老师也曾来信鼓励，提示了一些西方服饰史研究的现状。

2016年8月那个暑假，我在福建漳州第一次见到四川大学的冯渝杰博士。让我意外的是，研究早期道教历史的渝杰兄说他也曾阅读过拙文，表示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很感兴趣。于是谈起他自己在从事的道教法剑研究，相谈甚欢。临走前，他说想借拙文最后的标题“微观史”，来策划一套书，希望我将《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改写成一本小书。我想既然是朋友邀约，就爽快答应了下来。没想到渝杰兄效率极高，过了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赵静女士就发来出版合同。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的是，“微观史”的概念是我从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借用的。彼得·伯克评价微观史家说：“他们虽不敢称从一粒尘埃看整个世界，但也必声称从局部数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2]这也让人想起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主张——“今天家里的灰尘也有社会史”。二者异曲同工。用尘埃这些渺极之物做比喻，并不是说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刻意地追求“小”。这其实是说，历史工作者需要对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事物进行关照，需要有透物见人、体察社会的洞察力。

有时候正是这些看似极端的主张却最能给人启发。我虽然没有能力像彼得·伯克或者柳田国男那样表达得让人过目不忘、深入人心，但此前也有类似的想法。我小时候学过几年画画，后来虽然荒废，但对

图像、古物一直抱有很大兴趣。我一直想尝试以新的方式研究这些古代的名物。大致想法是，不管器物大或者小，我都希望透物见人，看到器物背后的社会史。如果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物的社会生命立传”，即绝不只是关心物品的形制、类型，更重要的是关心它的社会意义。具体到本书的思路，即是将“嘉礼”中的冕服巾帻制度视作一种“视觉符号”，希望通过头饰的变动，来观察政治人物的权力兴衰过程，并试图从“微观”的角度，将头饰看作是表达群体所属、群体关系、群体认同的物质符号，试图从君臣“私”的关系领域更为细致地刻画、揭示唐代迄至五代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人际关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书始终将舆服置入政治史的脉络里进行观察，将每次唐代服饰变革视作一次政治事件，而不是抽离出来当作简单的文物制度。

正所谓“知易行难”。要把理念付诸行动，需要相关的知识储备、写作技巧。我至今后悔自己当时稍显草率的应允。因为真正在进行写作、加工的时候，我才知道把一篇学术长文改写成一本书的难度：既要谨慎行文，又要通俗易懂；既要照顾体例，又要控制篇幅。修改书稿期间，我也打了好几次退堂鼓。不少研究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时间过得太久，就会对旧的文章、旧的话题提不起修改的兴趣。一是因为完成一篇论文，前后阅读、修订必不下十数遍。阅读生倦，审美疲劳也是常情常态。二是因为有过学术写作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写易改难。如果文章的思考高度提升不了，再怎么修改，也只是文字上的润色，修改迁延也只能让人有徒劳无功之感。在诸多困惑里，书稿拖延多时。2017年4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章涛、赵静、邹近三位友人来访武汉大学，因为还在配图，我依然没能拿出定稿，颇感歉疚。后来由于学术兴趣的转移，我甚至一度打算放弃。但作为出版方的诸位朋友十分宽容，纷纷安慰说不着急，鼓励我完成这本小书，并签署了增加稿费的新协议。本来说好2018年年底交稿，但作为“高校青椒”，家里家外俗务丛脞，中间又要完成其他写作任务，依然没能准时交出书稿。直到2019年年初，才最终将定稿交予出版社。

相比于此前的《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一文，书稿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扩展至晚唐五代，因此书名叫作《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以示研究时段、写作范围。原来发表的《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一文因为发表体例的限定，不便大量插入图片，不少读者表示图片示例不够。如今蒙出版社慨允，这本最终的小书，不仅增加了内容，而且配了大量新的彩图。我也知道小书的局限。由于时空变换千年，文字、图像资料有限，虽然文中尽可能利用了多种途径和方法展开相关论证，但在涉及人物具体“图景”的层面仍感乏力。如果小书能带给读者一点点图像感，也是我愿。

书稿完成后，时任《澎湃新闻》编辑的饶佳荣兄帮我审读了全稿，从编辑的角度给我提了不少意见。李兆宇、杨磊、毕康健三位同学帮我做了初步的排版与校对。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吕博

2019年11月21日

写于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

---

[1]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孙淑强、金筑云译《规戒与惩罚——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2]参见［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页。